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一生不放弃理想

——写在费利普•塞尔兹尼克去世一周年

安藤忠雄的格物之美

没有城管 但有牧师

温暖的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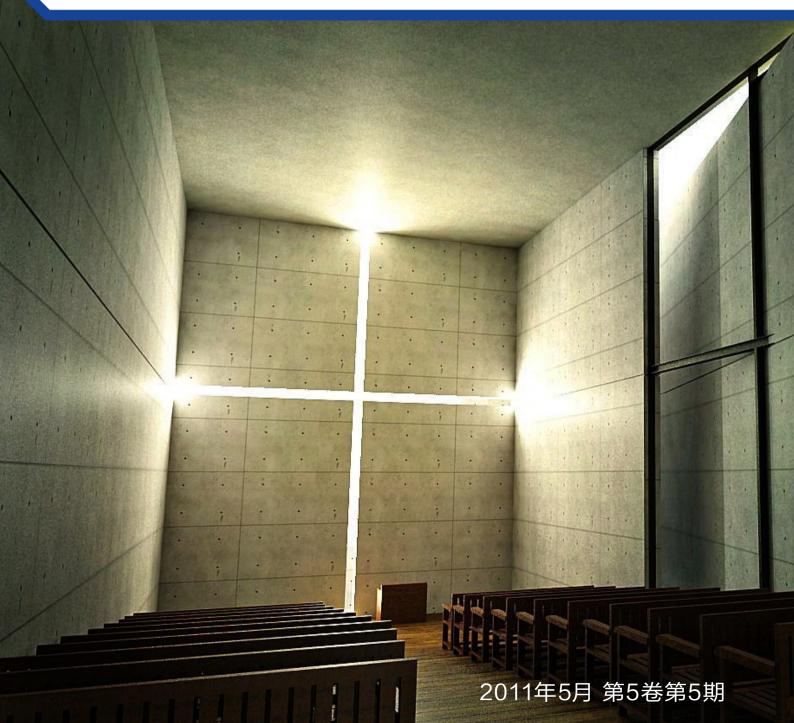
——北井一夫视野中的北京

如果希望向前走得更快, 必须时常回头看看

——专访君特•施鲁施彻

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

——专访马勇





执行编辑

苏小和 干晓渔 成庆 言 汪 伟 扬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成庆

观察员

写作: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北京)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

扬 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 舞(北京)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细则

- O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 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 味,不求客观统一。
- O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 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 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O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 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 的批评。
- O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 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 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 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 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O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 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 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 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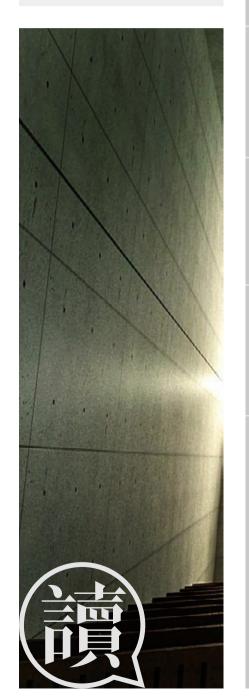
江默者不再沉默, 当呐喊者开始行动, 历史或许从此悄悄地向另外一条岔路展开, 而在这条泥泞、甚至崎岖不平的历史分岔路上, 无论保守或激进的声音, 都不得不退居历史的幕后, 眼睁睁地目睹灾难的发生。

• • • • • •

这时候, 什么力量才能改变历史?



目录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写作•朱航满

社 会•夏佑至

思 想 ● 成 庆 **文 史 ●** 王晓渔

001-015

美利坚 ● 孙传钊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一生不放弃理想

——写在费利普•塞尔兹尼克去世一周年

016-023

书评

• 刘 柠

安藤忠雄的格物之美

024-027

随笔

。罗四鸰

没有城管 但有牧师

028-038

艺术

• 刘柠

温暖的景深

——北井一夫视野中的北京

039-041

访谈

• 孙骁骥

如果希望向前走得更快, 必须时常回头看看 ——专访君特·施鲁施彻

• 灵 子

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 ——专访马勇

042-058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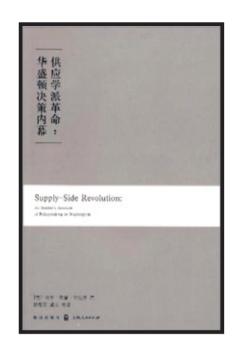
近期读得仔细的书,是《**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 策内幕》(罗伯茨著,杨鲁军、虞虹译,格致出版社, 2011年4月**),动因是这本书为眼下正在蔓延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

在经济学流派的意义 上, 罗伯茨提出供应学派, 并冠之以革命性的定义,事 实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批评。在 最基本的经济学供求关系问 题上, 凯恩斯否定了以萨伊 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 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 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 求"这一传统的理论。相当 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 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 于凯恩斯主义,东方专制主 义政府更是在凯恩斯主义 的口袋里,找到了大政府操 控市场的计划经济理由。但 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 年代,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

"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 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

显然,现在提出供给创 造需求,提到供应学派,是 很应景的一件经济学概念。 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核 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 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 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 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 态。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 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 需求;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 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 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 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 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 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 也是暂时的;第三,货币仅 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 和卖不会脱节。

按照这样的陈述,萨伊定律显然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过去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过分注重需求而忽略供给,即忽略了运用刺激生产力的方法来同时解



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第一就是要减税,使企业和个人的税后净收入增加,以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生产力提高和供给增加,这样就可抑制以至消除供给增加,这样就可抑制以至消除进影胀。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方面可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杜绝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心理,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从而使失业减少。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供应 学派的书,显然不是在这里说 一些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 而是提醒一个事实,在中国经 济的今天,政府既不会主动 减税,也不会削减体制内的 社会福利开支。中国的经济问 题,是一个不符合理论路径的 经济现象。这也许就是所谓特 色吧,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 以特色之名,坚持莫名其妙的 错误,背离常识。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是 每逢必读,而且是精读。这 回拿到的,是他最近的结集 《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 艺出版社, 2010年12月), 书 中提到诸多先生求学时代的 小故事, 芳香可口。比如余先 生回忆,他细读钱穆先生的 书,读书笔记写满了整个纸 张,钱先生看到之后,说应该 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处,等日 后遇到与他不同的观点,可 以整理出来,记录在一起,以 此做到兼容并蓄。余先生感 叹,钱穆先生的这种学术雅 量,影响了他一辈子。

余英时先生虽然客居美 国超过了半个世纪,虽然他 具有足够宽阔的世界视野,但他的史学方法,却一直坚守纯正的中国范式。在诸多具有大气象的海外大家之中,余先生多年以来总是提醒众人,不要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之中,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

这正是余先生的学术立 场:把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 视为固有的起源和独立生长 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先生 沿着两条路径工作:

第一,中国文化必须按 照其自身的逻辑并同时以比 较的观点加以理解。所谓比 较的观点, 先生指的是早期 帝国时代与印度佛教的比较, 以及十六世纪之后与西方文 化的比较。而十九世纪以来中 国与西方的第二次相遇,毫 无疑问是震撼世界的历史现 象。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中 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 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 自身的逻辑而没有比较的观 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 无疑 将冒着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 义的古老窠臼的风险。

第二,余先生总是将焦 点放在历史阶段的转变时 期,他认为无论是孔子时代, 还是孔子之后的时代,中国 与其他文明相比,悠久历史 的连续性,非常显著。这种不 断演进的过程,连续与变化 相互交织,因此,余先生试 图弄清楚中国历史上重要的 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试 图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 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 余先生将他的注意力,锁定 在一个重要的范式:"道"。 并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 的价值上似乎存在着大量 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毕 竟也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 严的承认。因此余英时比谁 都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 "道"的主流,中国与西方相 对的一系列问题,就终结了。

问题在于,余英时先生 孜孜以求的中国之"道",那 个被孔子,老子反反复复陈 述的"朝闻道,夕死可也"、 "道可道,非常道",真的就 是中国人的终极真理吗,是 不是也是老子、孔子们的一



种虚无的追问呢?这正是所有试图在传统文化里寻找中国人的现代性的最大的危险,如果孔子、老子的追问是不确定的,那么余英时先生坚守的"道",同样也是不确定的。那么,余先生的工作,要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赋予"道"以明确的定义,要么从西方语境里寻找真正的"道"。

余先生当然是智慧的, 他提到了联合国1948年的人 权共同宣言,关于人权的界 定,即人权是对共同人道和 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余先 生的意思是说,儒家伦理虽 无人权名词,但毫无疑问,具 有人权的理念。

当然,《辩论"中国模式"》(丁学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这本书,仍然在我的重点阅读中。这是我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仔细琢磨的一本书,我不是说这本书有多少惊人的学术价值,而是认为丁先生的思考,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我手上有个课题,名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与

企业史的双向叙事",志向 可谓宏大,是想在经济学的 语境里,找到一个国家百年 来经济变迁与企业家命运 沉浮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 块学术领域,看似热闹,其 实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并 不多,商业史方面,或者说 综合性的历史陈述方面,郝 延平先生,白吉尔先生,当 然还有费正清、刘广京等泰 斗级学者的著作, 值得我反 复研读,但单纯的经济史方 面,可谓空白,只有杨小凯 先生的"百年中国经济史" 以文章的形式摆在我面前, 这是先生生前未完成的工作 之一,我读到的,基本算是 一个学术纲要, 值得展开的 余地非常大。王晓渔君曾经 多次和我提到,沿着杨小凯 先生的思路,做一些铺陈的 工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情。至于经济史和企业史的 双向叙事方面,几乎就完全 无文献可查了。值得庆幸的 是,我在丁学良先生的这本 书里,零星地捕捉到了一些 与此有关的思考,包括一些 框架性的分析。虽然丁先生



没有刻意为之,但于我,却是莫大的启示。

当然,作为热点中的热点,"中国模式",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辩论,看上去热闹纷繁,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一方面,这种集中了威权体制、有限的市场竞争、高强度的主义倾向,并非中国家贸易层面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非中国的制度创新。所谓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从经济史上看,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策略,到20世纪上半叶,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尤其是



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从所有的方向解读中国的思想企图,事实上首先放弃的是某个专业的路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么繁复的话题,好的学问家显然不会去寻找一个更加繁复的学术模式来解读中国,因为这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空洞。为什么不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呢,事实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

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惟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是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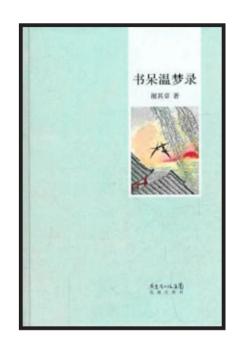
如此一来,所谓"中国 模式"的辩论,更多的可能 仅仅是一个蔓延在街头巷尾 的话题,一个人人都想参与, 但人人都莫衷一是的谈资。 丁学良先生的思考,就是站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的多重路径上,对今天中国发展进行的一次综合性、非学院性质的工作,这让很多关心中国的人们的思考有了一个必要的参照谱系。读完此书,你会对今天中国的基本现象背后的逻辑,有一种比较宽阔的了解。而对于未来中国的走向,丁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不断持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作为读者之一,我深表赞同。♀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

因为定下了买书即读的 规矩,自然是错过了很多的 好书,诸如5月上旬到了趟北 京,在京城的成府路豆瓣书 店,看到一册《美国散文精 选》(高健选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0年1月),精装, 毛边,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 放回了书架。因为精装固然 很好,但携带与翻阅皆不便; 毛边也有特色,但又舍不得 去裁,否则就真有些买椟还 珠了。出了书店,就有些后 悔,但咬咬牙,还是最终没有 再返回去买,因为这册《美 国散文精选》的译者高健, 我比较陌生, 而最想读到的 《美国名家散文选读》(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 翻译者, 乃是著名的现代文 学研究者夏济安,他的译笔 典雅,连董桥都赞叹不已。 这样的安慰固然能够说服自 己,但还是隐隐有些遗憾, 这册《美国散文精选》(A Treasury of American Essays) 由上海译文出版 社出版,选文精当,诸如我所知道的富兰克林的《静生詹言》、华盛顿 欧文 大春宫》、华盛顿 欧文 大春宫》、华盛顿 欧美斯大寺》、爱默生的《谈美》、霍桑的《古宅政及 医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等名家妙文,均有收录,整本书的装帧也实在优雅,除了毛边之外,封面用了乳色的布纹精装硬纸,再有一帧印刷极好的小幅版画,整个设计显得简洁、大方,令人过目难忘。

恰巧近来翻读藏书家 谢其章的随笔集《书呆温梦 录》(花城出版社,2011年3 月),其中有文章《毛边书是 阅读的反动》,也写到了这 册《美国散文精选》的毛边 本。不过,初读他对毛边书的 态度,竟与我有些相仿,"毛 边书是对书籍本身功能的反 动,这话也许说得不大得劲 儿,还是打个比方吧。邮票 的功能是邮资,是寄信使用 的,可是一旦进入了收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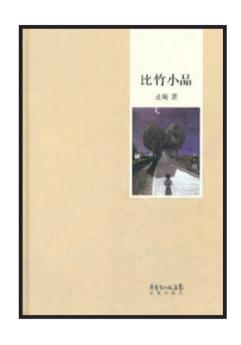
范畴,邮票原来的固有属性就发生了动摇甚至完全改变了原有属性,这是现成的例子。当然这种动摇或改变,并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反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一开始是集邮的后来才转入搜集图书。我写过《别矣,我的集邮》,意思有点像现在对毛边书的态度。"这是从图书的态度。"这是从图书的功能上来讲的,想想也对,我之前很少眷顾毛边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书毕竟还是要供人阅读的吧,想来

那册自己不曾购买的毛边本 《美国散文精选》, 也便稍稍 有些释然了。但谢其章很快 笔调一转,继续写到:"我写 的书,每本都嘱咐责编做些 毛边本。"他仅藏有一册自己 的著作《漫话老杂志》的毛 边本, 当初出版时请编辑做 了10册毛边本, 2册为编辑自 留,其他的赠送友人,自己只 留1册作为纪念,如今却有人 欲出高价购买他仅剩的这1 册,但最终还是被他拒绝了, 为此,他又坦言到:"我对毛 边本的态度是游移的,多重 标准的。"

谢其章说他也偶尔收藏毛边本,其中便有书话大家姜德明先生赠送给他的几册毛边书,计有其编著的《北京乎》、《余时书话》以及《书边梦忆》等著作,特别是《余时书话》一册,初版只印了1500册,其中毛边书也只做了100册,可见其珍贵。为此,他也留意毛边本的情况,"上海译文社最近出了一系列精装毛边本,做工很精致,内容又是我所喜欢的,当即在当当网订购了其中的

《美国散文精选》,其中一 篇《古宅琐记》,最初读的 是北岳文艺版,那时的书做 的真够粗糙的,但是那时读 书就是读书,不大关注书的 外貌。"可见,毛边书自有其 风情万种之处,那种独特的 美学效果连鲁迅也曾喜爱, 并自称是"毛边党"的一员, 他在1935年7月16日给萧军 的信中,便如此写到:"我喜 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的 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 或尼姑。"诸如鲁迅这种对 干毛边书的态度,真可算是 决绝了。与谢其章的《书呆 温梦录》同为一套丛书的, 还有止庵的随笔集《比竹小 品》(花城出版社,2011年 1月),其中也有一篇专谈毛 边书的文章《也谈毛边书》, 恰巧也一同买到了,不想翻 读时, 竟见他也提到了这册 被出版社特意做成毛边本的 《美国散文精选》。

与谢其章对待毛边书的 态度相仿,止庵强调自己也 从未刻意去收藏过,更算不 得如今有些如痴如狂地予以 收藏的"毛边党"一员了,只



是他对于毛边书的认识,却 别有见解。为此,他先借用周 氏兄弟的看法,认为毛边书 不仅有独特的美学效果,而 且还有自己的实用效果的, "现在的人说中意毛边书, 多只强调'好看'和'边裁边 看',忽略了'毛边可以使书 不大容易脏',而且几乎忘记 了毛边书最终可能需要再行 裁切。"进而,他又再借谷林 老对毛边书的认识,算是对 于毛边书也做了进一步的解 释,强调最佳的毛边本,在 满足个人嗜好的基础上,还 应更多考虑读书人易于存放 和不易脏污的实用特点的, 因此,好的毛边本是有一些

特别的要求的:"所谓'毛 边',用现代流行语来状摹, 也算是一种'包装',但采用 的是减法而非加法,即在印 妥下机装订后即行出厂,省 却一道切边的下序。这里要 注意一点,即在拼版、折页 之际,不可忘掉'地齐天毛' 的老话。盖真正的毛边只 在天头和书口,至于地脚虽 亦不施刀切光, 却是整体平 直的。因为所印已非线装古 籍,上架一概竖立而不是平 置,如果保留毛边,则不耐摩 擦,很快就会卷边折角,自然 也极易玷污,势必有一天会 让藏书者不得不送它到印刷 所去补切一刀以资革新。"

如今许多"天地齐毛" 的毛边书, 止庵认为不过只 是半成品, 谈不上什么美观

的,"是以我对这种玩意儿一 向不大当回事儿, 朋友送书 给我,我宁肯要光边的。偶 有例外,譬如前不久面世的 扬之水著《奢华之色》,毛边 三面均隐于精装书壳之内, 堪称精致;又《美国散文精 选》和《培根随笔》,书页上 下切光,留书口不裁,亦算漂 亮。"读到这里,我几乎大大 地后悔了,因为这册《美国 散文精选》不但是毛边书, 而且正是谷林老所希望的 那种理想中的毛边本,实算 是难得了。如此,不出三日, 竟然有些着魔的感觉了,之 前所坚守的那点个人防线, 也终于彻底溃散了。于是匆 忙出门,直奔书店,发现还 有两册《美国散文精选》在 书架上, 便迅速选了一册品

相较好者拿在手中, 反复摩 堂, 仿佛自己也中了这毛边 秀色的诱惑一般。随后,又 在书店细读了该书后封上的 出版介绍, 竟也是典雅与妥 帖的大家手笔,也才得知, 此书本是早年出版过的经典 译作,只恨自己鼠目寸光罢 了,"本书为北岳文艺出版社 所刊印的《美国散文精选》 (1989)的重印本。重印的 目的出于以下考虑: 据我们 所知,该书自发行以来即深 受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 读者的广泛欢迎,但由于当 年印数过少,且又迄未重印, 目前书市已绝迹,致使购 书者每每废然而返。有鉴于 此,我社决定重刊此书以满 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使优 秀译本得以再获新生。" 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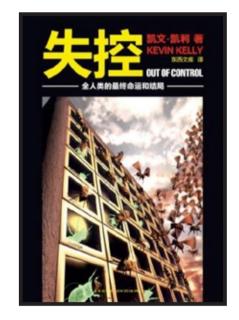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上海, xiayouzhi1997@gmail.com)

老书新译的好处在于,原版起码经过了时间考验。 《失控》(凯文·凯利著,新 星出版社,2010年12月) 的英文初版距今有17年,在 互联网时代,无疑要算是老 书,最近出版的中文译本包 贵也很厚,但值得花时间一 读。除了重温凯文·凯利对 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大多 数都应验了,尽管形式有所 不同——这本探讨机器与生 物关系的书提供了特别的视 角,让我们重新考虑人类社 会运转的基本形式和动力。

经过奥地利学派尤其 是哈耶克的反复论述之后, 人类社会运转的形式和动力 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母题。 《失控》则从生物进化和计 算机科学的角度,检验了哈 耶克的若干重要结论:互联 网技术营造的并非一个虚拟 世界,相反,是因为遵循了哈 耶克为人类社会总结的那些 规则,这门学科才得以快速 成长,最终改变了世界。 在凯文·凯利看来,机器、生物和人类社会分享某种共同的进化方式。托马斯·霍布斯断言,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地约束社会成员,人类就只能在利己的泥淖里彼此毁灭,但18世纪以来,西方却自治和法治的进分之起了基于自治和法治的理性寻求合作共存,而无需仅靠政府的强力维持刚性秩序。生物进化和机器演进的方式与此过程也很相似。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根本区别在于能否解放生命 的创造力。《失控》出版以 来的这17年,恰好是全球化 急剧推进的17年。经济一体 化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 新经济体急剧膨胀,其中以 中国为最。互联网为全球化 提供了动力,也是其中信息 流动的基本形式,作为全球 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同时 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制度元 素最大的受益者。个人自由、



市场经济和法治——这些制度元素,把中国人的创造力从全能政府的大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改变命运的激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放弃自上而下的控制,相信自下而上的智慧,在这里,"失控"可以与哈耶克的术语"自发秩序"互相替换。在全球化的自发秩序里,如果放弃对控制根深蒂固的迷信,中国当然有机会做得更好。经济增长理应与开明的政治同步,我们应该过一种理性而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如果这些预期没能实现,并不是制度元素本身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水土不服。和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一样,垄断的权力带来垄断利益,掌权者并不会自动放弃对社会的控制。自治社会是斗争的产物;权力受到监督和约束,而后才能解放人的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失控》是一本朴素的书。如果套用汪晖教授的话说:凯文·凯利为什么没有倒掉?不得不说,明晰的风格有利于一本书经受时间的考验。

另一本风格明晰的书是何伟的《**寻路中国**》(李 **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月**)。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本书的主题——普通的中国人如何尝试改变命运——是对鲁迅名言贴切 的注释。尽管中国的官员都是超验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是:世上本没有路,领导说有,也便成了路),但普通中国民众相信自己的经验。他们的平静和躁动、欢喜与悲伤,他们的得与失,让过去的10年时光显得充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这10年的重要前所未有。我想,今后很多年的故事,都在这10年里埋下了伏笔。总有一天,人们会再次书写这些故事——虽然未必是以《寻路中国》这种形式。

和那些明晰的作品相比,醉心于中国特色的论述——这是过去10年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不是概念含糊,就是论述粗暴,要么兼而有之。不管他们的故事从2008年的盛世开始,还追溯到更遥远的1966年,特色论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终

点。他们沉迷于自上而下的 控制,沉迷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为此不惜以暴力来主导 秩序。

逻辑上仰赖暴力的后果是暴力成为行动中的必然选择。网络上流传着一些视频:同一群人总是出现在不同的讲座上,用暴力破坏不同的讲座上,用暴力破坏归人的言论自由,使得讲座中断或根本无法开始。这种座面让我顿生穿越之感。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里详细描写过的冲锋队,如同这一幕历时久远的预演,只是规模和组织程度不同。

在那本伤感和悔恨之书 里,茨威格常常自问:零星的 有组织的暴行意味着什么? 它们是否开启了万劫不复的 深渊?有时候,问题真的比 答案还重要。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本期仍然想接着上期阅读报告的"少数民族"继续谈,边疆史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出现,同样也会在国力强盛时凸显,而且这两种情况常常会体现为内政与外交两个层面上。就如最近爆发的中越之间的南海危机与内蒙古的牧民抗议活动,都有意无意地提醒着我们,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在"盛世"下的不和谐音。

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实也是游牧文明与汉地的耕种文明相互摩擦、交融与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牵涉到政治、民族、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涉,就如最近的内蒙古的抗议活动,就是因为采矿业对草原的侵蚀而引发的民间反抗,这一方面是政府及矿产企业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则又可以表述为草原文明与现代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等等,尽管蒙古族

本身,在历史上其实已有相当剧烈的演变,远无法用一种本质性的草原文明或少数民族来作说明。例如美国著名边疆史学者拉铁摩尔在其名著中《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中曾对清朝时期蒙古族性格的演变有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观察:

多数的旅行家已经注 意到,蒙古民族已经不好战 了……蒙古民族趋向和平的 真正原因,是召庙的不动产 强化了为各旗及其首领划分 疆界的稳定政策,打倒了作 为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 性。从前,这种移动性可以限 制首领对其部属的向背滥用 权力。草原社会的变化,使战 争被废止了,而其代价就是经 济的退化与社会的奴隶化。

由此可见,蒙古因为处 在与汉地政权的边疆地带, 因此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 变经济模式与组织形态,甚至连常认为"桀骜"的民族性格也因此得以逐渐服帖,难怪当年皇太极就曾担心满人被汉化,"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而正是这样的"汉化"与"反汉化"的僵持之间,"异族"的"异"逐渐转化为一种之间,"异族"的"异"逐渐转化为一种共存,而这种地理与文化上的接触也使得清帝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会有如此多难以厘清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

这种认同危机,在历史研究方面,就体现为对"蒙元史"解释方面,如葛兆光在最新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2月)中,就有多处提到蒙元史与"中国史"论述之间的冲突问题,试图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性帝国概念来取代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或许麻烦在于,当下的意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识形态会习惯性地利用"华夏文化"、"中华民族"等概念来建立起一套以汉族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似乎"汉族"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心。

这种"明尊暗贬"少数 民族的思维倾向并不是新 鲜事物,就如拉铁摩尔在 其回忆录《蒋介石的美国顾 问一一拉铁摩尔回忆录》 (矶野富士子记录,吴心伯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中所记载的,他在抗战 时期发现,蒙古人对于抗日 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 一些蒙古民族主义者还与日本人暗通款曲,拉铁摩尔就曾建议过,假如要让蒙古加入到抗日的阵营,则可能要以"蒙古自治"来换取。而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们,对蒙古的国民党将领们,对蒙古族充满着偏见,拉铁摩尔甚至记录下傅作义的这样一番言论:"蒙古人里没有像你我这样的文明人,他们是牲口。如果干活,就喂养他们。"如此直白的话语无疑显现出,历代中央政权对待边疆问题上暗涌的强权逻辑。

"中国"虽然存在固定的疆域,但它真的一成不变吗? 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就从历史上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来着眼,来考察所谓"华夏文明"是如何在"和亲"与"征伐"的不断变换中进行建构的,如果从边疆史、区域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或许应像当年抵制"西方中心论"那样去抵制

所谓的"汉族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今日所谓的"中国中心论",今日所谓的"中国模式",表面上看是对抗西方普世价值,但回到国内,何尝不是一种"主流压制边缘"的逻辑?君不见许多汉地民众在面对藏区信仰时的那种无知与粗暴,简单一点说,难道修铁路、修高楼就一定是人人都要的?

宗教在1949年之后日常 生活中的消失,的确是今日 文化各种怪现状的一个原因 所在,但这个过程到底是如 何发生,如果演变的,却少见 有人详加考察。最近偶读汤 用形的《往日杂稿 康复札 记》(三联书店,2011年5 月)的"康复札记四则",看 到这样一段话:

在旧社会, 幻想中有不 灭之神, 在新时代, 确实有 很多再生之人, 我自己就是 其中之一。1954年时因多年 积病, 患脑溢血症, 近一月不 省人事, 但得党无微不至的 关怀, 竟得不死。

我无意揣测汤先生当时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写作此段文字的真实想法,但至少这部分反映出1949年前后一般人宗教形态与信仰内容的一些变化,而且有趣的是,"再生"此类话语,本就带有强烈的信仰色彩,而且将"不死"与"党的关怀"这般链接起来,也让我们对这套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生死"不再属于未知世界的议题,反倒被带入政治力量的管辖范围,近来学界好谈"灵知主义",不知这是否也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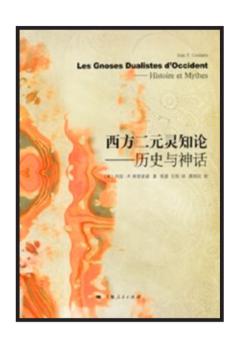
说到灵知主义,这里想附带推介一本被大家忽视的好书,约安 P.库里亚诺的《西方二元灵知论——历史与神话》(张湛、王伟译,莫伟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谈灵知主义,国内比较熟悉的有约纳斯、沃格林,虽然沃格林曾提到过灵知主义与神秘主义(包括炼金术等)之间的关联,但库里亚诺则才是

一位专门研究灵知主义与中世纪魔法的天才,他出身于罗马利亚,早年研究印度学,1972年逃离罗马尼亚,一直对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耿耿于怀,他这么写道:

我1972年出逃,但心 灵上的创伤持续了约十年, 直到1989年12月才完全平 复。当时,那个世界的统治 者和他的配偶已被处决,我 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尸 体。也许我已康复,可罗马 尼亚不会了。

就是这位研究灵知主义的天才,却在1991年5月21日被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厕所里谋杀,案件一直悬而未决,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最后再推荐一本勋伯 格的古典音乐评论《**伟大指 挥家:**〈**纽约时报**〉音乐评 论》(**盛韵译**,三联书店, **2011年4月**)。爱乐者当知,



此勋伯格非彼勋伯格,乃是《纽约时报》的著名乐评人,大陆曾出版过他的《伟大作曲家的生活》(三联书店,2007年),但似乎关注者寥寥。这本评论集的最大好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纵览20世纪最为著名的指挥,可谓是简要的古典指挥简介手册,虽然我曾也收罗了不少国内鲜见介绍的指挥家的英文传记和回忆录,但其实要想一本本地啃下,却也只能是想象中奢侈的享受了。Q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2011年的江西,出现 两位"小人物":一位是新余 刘萍、一位是抚州钱明奇。 刘萍准备参选人大代表,被 "喝茶";钱明奇因为拆迁 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制造了 连环爆炸案。两位"小人物" 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上 访者。对上访比较陌生的朋 友,可以参考赵亮先生的纪 录片《上访》。

刘萍和钱明奇的选择, 说明上访者已经发现:上访 仅仅是一种"自慰机制", 许诺一个虚幻的青天。如果 公民在下、政府在上的格局 没有得到改变,上访就只是 没有得到改变,上访就只是 就足公权机构和公务,可能 满足公权机构和公务,可能 满足公民的权利诉求。在纪 录片《上访》里,上访者 渐意识到只有成为选民,政 府才会躬身倾听他们尚未把想法转 换为行动。

一个又一个徐武,证明 上访不是通往权利之路,而 是通往"被精神病院"之路。 在"自慰机制"失效之后,刘 萍选择了选票,钱明奇选择 了炸弹。选票和炸弹,孰优 孰劣?不用多说。打压选举, 等于在公开鼓励暴力; 打压 刘萍,等于在公开呼唤钱明 奇。即使钱明奇,也和杨佳一 样,并非最初就选择了暴力, 而是试图遵循既有程序解决 问题。据《东方早报》(2011 年5月28日)报道,在钱明奇 的卧室里,有很多法律书籍, 包括《新编房屋拆迁补偿安 置法律手册》、《拆迁安置 补偿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 准》、《房屋拆迁、补偿和安 置》、《侵权赔偿法律试用 全书》等法律书籍十余本。 置身事外,反对暴力,并不困 难;但是,如何说服穷途末 路的当事者放弃暴力,这是 一个难题。

在公民纷纷参选人大代表之际, 五年前出版的《我 反对: 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 传奇》(朱凌著, 海南出版



社,2006年)依然有着参考价值。湖北潜江的姚立法先生,独立竞选,1999年当选人大代表。但是这位人大代表,却被视为"异议人大代表,却被视为"异议人士",不断遭到打压。艾晓明先生的纪录片《人民代表姚立法》里,出现过这位人大代表。如果有一天,人大代表独立竞选不再被视为"传奇",人大代表表达异议不再被视为"说三道四",暴力恐怕才会失去用武之地。

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 赵心树先生的《**选举的困**



HISTORY&CULTURE 文史

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 批判(增订版)》(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8年)有详细 阐述。作者专门在后记中解 释,标题中"批判"一词,不 是红卫兵之"批判",而是 康德之"批判"。该书对美 国的选举制度不乏批判,但 是对市场、法治、民主、自由 并无否定,这与渐成明日黄 花的"新左派"不同。"新左 派"的特长是:面对极权主 义,"情人眼里出西施";面 对民主制度,"鸡蛋里面挑骨 头"。有些遗憾的是,作者依 然试图从法家里寻找法治脉 络,可谓南辕北辙。如果作 者能够通读《商君书》,或许 会改变这种观点。

金雁先生在《苏联解体 20年祭》(《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2日)里引用一 位俄罗斯学者的话,指出世 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 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 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把人当做目的, 还是当做手段? 这是两种根 本不同的现代化。金雁的《从

"东欧"到"新欧洲": 20年 转轨再同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年4月),讲述了 东欧诸国从"以人为代价" 转轨为"以人为主体"的历 程。所谓"东欧",本身就是 冷战时期的概念,"东欧" 的知识阶层多对这种命名不 以为然。金雁用"新欧洲" 称呼"转轨完成国家",以区 别"转轨中国家"。按照"环 球体"(即《环球时报》的文 体),公众呼吁宪政民主的 社会运动是"打砸抢烧", 转型的结果是"动荡不安", 转型后的公众心理是"今不 如昔"。金雁的著作,足以解 "环球体"之毒。

5月26日,塞尔维亚警 方发现失踪多年的姆拉迪 奇,并将其引渡至位于海牙 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这位被"环 球体"视为民族英雄的"士,将因种族灭绝罪、战争 罪和反人类罪接受审判。理 解这一事件,要从姆拉迪奇 的"亲密战友"米洛舍维奇 说起,米洛舍维奇,曾被视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



于这位"老朋友",《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有具体分析。

德国学者格茨 阿利的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 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有一个章节标题是"受欢迎的独裁",如同桑塔格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我很喜欢这种说法,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残暴,更在于这种残暴以"受欢迎"、"迷人"的方式出现。格茨 阿利讲到纳粹如何创造"德国金融奇迹"。金雁也讲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如何展现



HISTORY&CULTURE 文史

出国家富强的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景象,虽然这种"国富"以"民弱"为代价,但是公众往往会大公无私地沉浸在"道路"、"模式"、"奇迹"这种宏大叙事里。

最后,推荐沈启无先生 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东 方出版社,2005年)和《大 学国文》(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阅读这些文 字,可以在这个树欲静而风 不止的时代调养生息。沈启 无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 并称苦雨斋四大弟子,虽然 后来沈启无与周作人失和, 但是他的文学趣味始终是六 朝的和晚明的。他曾写过一 首《除夕》(载苦雨斋文丛之 《沈启无卷》,辽宁人民出版 社,2009年):

诗人如果是流离之子 请为世人唱哀歌 中年的光阴寸寸是忧患 今天我是晚间的来客 愿有一个孤独的安息 因为倦于明朝的行旅 在这黯然的灯光下 我从头温习自己的书卷

Q



一生不放弃理想

——写在费利普·塞尔兹尼克去世一周年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sunchuanzhao@yahoo.com.cn)

2010年6月12日费利 普·塞尔兹尼克去世了。进入 21世纪后, 他几次访问中国, 与中国法学界、特别与北大 法学院有密切的交往,最后 一次是2007年。2009年上 海还出版他的《社群主义的 说服力》中译本,是继《转变 中的法律与社会》(1994年与 诺内特合著)之后的第二本 中译本。一年来在网络上未 曾见到我国学界纪念他的文 字,曾与他有直接往来的北 京大学的大学者们是不是已 经忘记了他? 倒是让我不禁 产生写几句的想法。中国读 书界关注他的晚年著述,而 我却喜欢读他学术生涯前期 的组织学著作,特别是那本 《组织武器》,那里面有许多 我们熟悉的现象被塞尔兹尼 克抽象地概括出来,这是中 国学者缺乏的学力。拙文也 略作介绍,表达对逝者的追 念,也希望中国出版界的伯 乐能推出它的中译本。

"纽约知识分子"中 社会学家群星璀璨:刘易 斯·科塞、达尼尔·贝尔、西 蒙・李普塞特、大卫・李斯 曼、爱德华特・希尔斯、内 伊萨·格雷兹。塞尔兹尼克 也是其中一位。他可以说是 个比较典型的"纽约知识分 子"。父母分别是来自罗马 尼亚和俄国的贫困的犹太移 民。16岁那年考入聚集不少 犹太左翼学生的纽约市立大 学,成了"纽约人"。先后加 入过美国工人党、从属于社 会党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大学时代他虽然积极参加左 翼运动,但是读了米歇尔斯 《现代民主主义中的政党社 会学》(中译本为《寡头统 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 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和经历了社会主义政党内部 错综复杂斗争以后,对社会 主义政党、组织本身抵御腐 化自律能力、工人阶级是否

能担负起社会变革重任、社会主义文化能否与传统文化断绝等问题产生怀疑。在同人刊物《探究》(Enquiry)上撰文提出这些疑问,遭到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严厉批判。1943年参军入伍前往欧洲战场,结束了他左翼政治活动。

塞尔兹尼克1938年进 入哥伦比亚大学时压根没 有考虑以后成为学院人、以 学术为终身职业。当时还与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实践保 持着联系,而且为了凑齐生 活费和学费,还不得不打几 份临工,不能全力以赴对待 学业。1942年以后为了写博 士论文搜集材料,不久学业 却因为参军而中断。但是, 1946年战后美国大学为了 安置大量的复员、退伍军人 扩大招生,为塞尔兹尼克成 为学者敞开了大门。回国不 久他就在明尼苏达大学谋到 一个助教的职位,1947年他



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 教。塞尔兹尼克和一些左翼 "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诱 发他们的学者生涯起点是 对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追究 政治实践中产生的疑惑的兴 趣,以后转移到社会科学研 究上面去。他的学术研究一 开始最关心的课题,就是以 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遇到的难 题和困惑,想用科学的方法 来解开这些难题。他作为一 个前马克思主义者,经历过 组织内部存在种种的两难 矛盾,为了从学理上解开这 样难题, 他成了20世纪最重 要的组织理论的大师。1947 年他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提交了博士论文——《田纳 西水利局的草之根》(TVA and The Glass Root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1949). 他通过解剖作为罗斯福新政 实施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福 利的样板田纳西水利局的技 术、计划和工作方法,来演 绎组织如何适应环境取得成 功的原则。

地处阿拉巴马州的田纳

西峡谷的田纳西水利局不仅 承担当地的防洪、灌溉、发 电和化肥生产等事业,还要 更广泛地通过农业、林业来 促进当地社会的经济福利改 善。联邦政府鼓励当地居民 积极参与这些事业,给了水 利局更多的自主权——水利 局的经营组织成了一个特殊 典型的"自上而下"形成的地 方分权机构,它要在联邦政 府的体制内保持自己的独立 性,实现广泛的、与当地居民 利益密切相关事业。它面临 组织上的难题:必须以独立 的自主权维护当地居民的利 益,又不能与联邦体制内的 其他部门、机构发生冲突。但 是,实际经营是处在各种利 益团体、组织压力的夹缝中, 发生了三个事前根本预料不 到的结果: 1, 得不到政治同 盟的组织支持,这些组织站 到敌对一边去了; 2, 水利局 本身原先追求公共利益的组 织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 3, 原先促进地区居民参与管理 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雇 佣的管理者与居民团体的监 督者之间的对立, 水利局的

方针不由自主转向限制居民参与转化。塞尔兹尼克后来在该书重版(1966)的序言追忆说,他的选题和研究中的微观精细分析,都是因为写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克服米歇尔斯《现代民主主义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欧洲工人政党、工会团体腐败的教训:专制的手段、抽象的理想、缺乏批评和评价的原则等原因导致了组织上的失败。

但是,塞尔兹尼克与 米歇尔斯不一样,他不是 站在怀疑主义的批评立场 上,而是积极从道德实用主 义出发反乌托邦主义。在 志同道合的丹尼尔:贝尔建 议下,他写了更直接表达自 己意图的论文《向米歇尔 斯官僚制铁律挑战》(The Iron Law of Bureaucracy: Michel's Warning to the Left, Modern Review, Vol.III, No.2, January, 1950)。米 歇尔斯在书中指出: 所有的 政党、组织都有三个难以克 服难题: 1, 组织发展趋势都



是取遭遇最小抵抗方向; 2, 组织的价值观都不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 3, 新的利益动机形成的组织核心歪曲既定的目标。而塞尔兹尼克的研究则想从技术上来解决这些难题, 他采用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 认为只要通过公共组织合理的行动就能克服米歇尔斯所说的这些困境, 甚至还能颠覆米歇尔斯说的这些困境, 甚至还能颠覆米歇尔斯的的官僚制组织具有非人性的特征的结论。

他认为, 所有组织体系 都有自己的追求,日常活动 都是为了实现这些欲求,维 护这个组织体系,发挥防卫 功能。这包括: 1, 调整与所 处环境中各社会力量的关 系一一涉及组织安全; 2, 保 障与权威之间沟通的途径 安定畅通; 3, 保持组织内的 非正式关系的安定; 4, 坚持 政策和决策根据的连续性; 5,不断思考组织的意义和作 用。他不仅重视组织与外部 环境的关系,也重视组织内 个体与组织之间关系,如果 组织部给与其个体成员相当 的选择余地,组织体系就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那就需要关注那些还没有显示出来的被压制、禁止的欲求,为了使得这些欲求实现,就需要从适应意识形态构造和非正式目标两方面出发来操作组织运营。

塞尔兹尼克以后的研究的选题也与他青年时代的政治活动不无关系。1952年问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组织武器:对于布尔什维克策略与战术的研究》(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是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是他受雇于兰德研究所时代的业绩。因为他是一个原共产主义者,通晓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组织为解剖对象,同时引入精神分析、心理学科的成果,来阐释组织深层和潜在的结构,验证自己的组织学的理论模式雏形。研究中,他忽视那些诸如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与其他组织相异的潜在、内与其他组织相异的潜在、内

部机构来分析。

他把布尔什维克党潜在的特征归结为"斗争党"。 其组织本身是它的斗争的武器。即"组织及其实践,追求权力的精英在竞争时可以使用不受合法秩序制约的手段,这就是把组织作为武器。"合法秩序首要的是权力必然附带责任,防止权力斗争带来的共同体核心价值、制度的质变。塞尔兹尼克把超越这种制约的组织实践叫做"组织武器"。

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掌 握的组织结构的原则, 那就 是如何把各种社会上自发组 织成员转变成自己真正的代 理人。也就是列宁所说"把 党员转化成主体"。作为一 个有凝聚力的政党,不仅要 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核 心精英不仅是党员,作为能 与组织一起进退与共的成 员,而且这样的组织,已经 不是业余性组织,具有专业 水准管理结构 (managerial structure)。为了对付千变 万化的情势, 党需要抓住所 有机会、动员所有的组织资



源,把操作党员也作为斗争的手段,所以必须完全控制组织内部成员。"完全控制"是依赖"隔离"和"吸收"两个途径完成。隔离,即使其成员与其他所有的道德、知性的世界隔离开来,把传统伦理和法的原则抛弃;吸收,则是把成员的能量、活力、时间都吸收到各种基层网络中去。与普通工人自发

群众组织不一样,其领导不需要得到普通工人的拥护。总之,政党已经不是单纯政治组织,成为管理组织,内部不允许宗派、对立势力共存;本来具有的民主意义要素的选举,现在也只成为需要严格管理的环节了。

他最后总结布尔什维 克政党的10个组织特征: 1, 党是由受过训练成员组成, 形成可以操作的基干组织; 2,把赞同部分宗旨的组织成员,改造成完全服从指示的成员;3,通过教化,把成员与外界隔离开,以至可以完全控制整个运动;4,为了避免形成局部的民主化活动,尽可能把内部斗争控制在最小限度内;5,组织最基本的活动是动员和操作;6,为了创造自己的道德守则,要充





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根据具体状况,使用辩 证法战术: 7, 组织应该是对 付孤立和瓦解的堡垒; 8,只 要所有的领域存在不断争取 权力的斗争,组织就能维持 下去: 9, 为了使得所有群体 屈从组织,党的活动要扩大 到包括阴谋活动在内的所有 活动中去: 10, 公开的合法 的活动与非法的地下活动相 结合。塞尔兹尼克还指出, 因为这种组织的特殊性,所 以组织的宣传理论,不能依 靠一般的社会教育来构筑、 进行,而且这种理论必须具 有明确、对工作具有指导性 和激励信念的功能。所以, 布尔什维克促进权力斗争的 理论建树的水平不低,其根 源马克思在理论在思想上、 道德上有鼓动力; 而列宁的 政党组织理论,对各种政治 实践有很大贡献。

塞尔兹尼克认为,在争取权力的途中,需要大众的力量,所以党组织也需要摸索一套政治战略。首先是接触战略,要避免孤立,要掌握渗透到势均力敌其他组

织和制度中去: 其次是中立 化战略,为了排除、孤立敌 对势力,使其他组织保持中 立:第三是正当化战略,制 造组织行为行使正当手段的 宣传、舆论。最后是使得部 分赞同组织宗旨的大众转化 为盲从——所谓动员战略。 但是,大众庞大得不可能全 体划一,为了使得不了解组 织目的的大众运动也可能被 操作,需要一个洋葱式的组 织层次,自觉的精英组成核 心部分,外面是信仰马克思 意识形态党员,再外面一层 是党内的大众,最外层的大 众是党的同路人。(塞尔兹 尼克的洋葱式构造模式,与 汉娜 · 阿伦特归纳的结构模 式雷同)。

塞尔兹尼克认为,近代 民主化兴起、精英文化的衰退形成大众社会,但是,大众 社会中一般的"大众"仅仅 是表面上皈依了普遍价值, 并不真正理解普遍价值,由 此降低了社会制度的价值 及其功能,另一方面他们却 又是民主主义意义上解决 社会冲突的力量。然而,塞 尔兹尼克说即使接受过教 育的中产阶级中也存在这样 的大众,包括一些重要组织 领袖。他们不能承担起原先 应该担负的领导责任,他们 自身的"大众化"导致最后 不能捍卫民主主义体制。而 这些"大众化"了的中间阶 层中的一些斯大林主义者尤 其值得注目。概括地说, 斯 大林主义者是党的同路人。 他们不能脱离制度和环境, 却为党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参加或支持党并不是出于信 仰,而是因为被边缘化失去 存在价值; 他们对理想和制 度没有深刻了解,而是基于 普遍政治观念和印象参加政 治组织; 所以取现实主义政 治价值观,其手段与目的完 全分离,政治行为往往是不 合理的或者追求某种心理补 偿。总之,斯大林主义者大 多是把未来委托给共产主义 又不脱离其生活的世界、对 边缘化充满了恐惧和孤独感 的人。他们在斗争中没有固 有的、确实的价值观,所持 的价值只是手段而已, 却把

这种"价值"作为普遍的法



则。这就是他们可能被操作 的基础。这样的人并不是单 纯追求共产主义,现实中取 无论哪种立场都有可能。在 美国他们实际上不是扩大了 共产主义势力,而转化成反 共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的 重大的社会作用是扩大狂热 的反共主义。塞尔兹尼克的 这一认识无疑是出于他以往 的政治实践的经验。这与汉 娜·阿伦特对原共产主义者 的评价大致相同。塞尔兹尼 克提出的对策是对知识青年 进行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的教育,培养能够有创造力 的维持传统文化的精英。

持续了研究生活几年 后,塞尔兹尼克的观念逐渐 远离青年时代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理想有更深的疑惑, 不再认为大众是对民主主 义的保障,趋向保守,寄希 望于社会精英组织起合理 的社会制度。冷战开始后, 麦卡锡主义的旋风导致了 不少犹太血统"纽约知识分 子"逐渐从激进的向现实社 会挑战趋向"顺应的"保守 主义。经历了政治实践挫折 的塞尔兹尼克至少也受到 这个潮流很大影响, 1957年 《行政管理中的领导地位》 反映了他政治立场的转变。 他在书中把组织和制度两个 概念相区别,组织只是实现 目标的手段和设计工具,相 对于组织,制度是社会需要 和压力的自然产物——适 应性的有机体——接近干人 们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产 物。在这个区别基础上,制 度的领袖们必须完成两个主 要课题: 1, 规定制度的功能 及其规划; 2, 设计体现这一 功能和规划社会结构。为了 实现第一课题,领袖必须明 确组织的普遍目标、担负起 决定组织最关键的价值和 规约责任;为了实现第二个 课题,还需要他指定的价值 体系对底层大众进行教化, 选拔管理干部,并且选择这 种制度赖以生存的外部基 础,而这些步骤必须在组织 初期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些 课题后才能放松控制,缓解 中央集权。根本的问题作为 领袖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要 阻止核心价值观的衰退,考

虑到负责、自律的精英的存 在与社会价值观延续两个 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领袖 必须专一关注制度的功能 和规划——作为经营者的 最核心的工作,在做好这课 题之后,解决制度内部的冲 突、矛盾、调整对外关系。而 解决内部冲突时,与斗争相 比, 更重要的是适应。我们 可以看到他已经抛弃了自下 而上革命的观念,认为主导 社会主流的应该是维护社会 核心价值延续的知识精英, 由知识精英对大众实施教 化,保障民主主义。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他观念中的民主 主义与大众、大众文化的对 立带来的困惑,完全消解了。 这种年轻时的政治倾向带来 的困惑,在他以后的著作中 依然顽强隐现出来,虽然是 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去。

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塞尔兹尼克的学术方向转移到法社会学,方法论回归到大学生时代所掌握的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的法社会学研究中,似乎少了一点对人类理性的限度和大



众狂热的恐惧,多了一点对 大众在民主主义建设中的创 造力的信心。他的理论不拘 泥于严密的法规结构,却重 视法规形成前夕对其产生影 响的各种要素,与法程序上 的形式公正相比,更追求实 质正义。他的组织学理论也 运用到法社会学研究中去。 他把能识别值得强制的、有 效的一种权力要求和义务看 作法及其活动的广义上的功 能;把法的强制功能与国家 强制功能区别同时也与一般 的社会规范相区别。与追求 法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学者不 同,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法应 该体现某种积极的秩序和追 求正义的理想。理想应该潜 隐在法中间。如果没有可以 而且应该实现的、接近的理 想模式,就没有一个对法现 象评价的客观基准。塞尔兹 尼克的对法的理想是: 1,一 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体制; 2, 没有任何恣意性的体制,依 据法条文实施时没有例外和 歧义; 3, 完全消除恣意性的 体制根本不是意味着只要形 式上规则和程序, 而是追求 实质正义,因为把形式和程序作为实质考虑的话,遇到特定目的(ad hoc)就会恣意伸缩、扭曲法律条款。他把法权威的功能与国家强制功能相区别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强调法的权威不是来。还是大多合理的原则、各理的、绝对权威的法制才能产生。这里也可以看到1960年代这个大众运动时代对塞尔兹尼克个人学术倾向的潜在影响。

1970年代末,他移籍加州大柏克莱分校社会学研究中心,那时与诺内特合著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是他的法社会学的代表作。他们提出要以压抑的法制、自律的法制、回应的法制——三种秩序类型进化过程来阐释法的原则的进步,也是社会伦理的进步。自上而下义和民众利益,而自律的法,不顾理想正义和民众利益,而自律的法将法与政府行政控制切断,取消了压抑的法制无限制的制裁权,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是机



械地运用,只考虑程序公正, 不追求理想正义,仍是不够的。最高境界是回应的法制,它拒绝单纯形式主义, 不仅严密服从法,而且通过 法的向多元群体公开性来实现由公民的理想来驾驭法、 实现公共秩序。美国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向"回应的法制"进步,塞尔兹尼克在《社群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提出他的政治设想。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 表明了塞尔兹尼克晚年的 "两栖性"的学术立场,与 新保守主义保持距离,试图 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嫁



接,实际上也是隐现了他早年政治实践的痕迹。青年时代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终身挥之不去。73岁时,他在《道德联邦、社会理论和共同体的承诺》(The Moral Commonwealth: Soci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Community,1992)一书的序言中回顾自己学术生涯,谈到青年时代

曾涉足托洛斯基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终虽然放弃了马列主义、托洛斯基主义,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建立在理性、爱、正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和社会变革理想,因此反对新保守主义。

早年《田纳西水利局的 草之根》是研究理想被扭曲 的要因;《行政管理中的领 导地位》却是研究实现理想 组织的条件。晚年关心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由主义左派的学说,重提杜威的进步主义,提倡重视权利的同时不能忘却义务和责任、强调共同体内"共同善"的重要性,而"共同善"形成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所以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社会学的哲学要建立在"社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Q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By Philip SELZNICK.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2. viii, 350 pp. \$5.00.

[美]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李清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22元。



安藤忠雄的格物之美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当尼采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没经历过 国家资本主义,更未预见到全球化。而在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主义国家,稀缺的土地 资源和庞大的建设预算,无疑使建筑师成 了离权力最近的职业之一。这点从世界著 名建筑师事务所间或披露出来的政府公关 费所占标的的比例上便可见一斑。

在今天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如果说伟大的建筑师是理想主义者的话,一定会被嗤之以鼻。但话说回来,如果一名建筑师完全脱离理想主义,甚至视理想主义如粪土的话,那他一定成不了伟大的建筑师,无论其中标、承揽过多少"伟大的"项目——这是我读过《建筑家安藤忠雄》之后最大的感受。

1983年,在位于神户滩区的山间谷地,出现了一幢造型奇异的住宅楼。背倚六甲山,前方俯瞰神户市区和大阪湾,沿山的斜面,一个裸露着混凝土的现代风格复合式公寓呈阶梯状嵌在山谷中,这就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经典作品——六甲山集合住宅(I期)。山体呈60度倾斜,从上往下看,公寓楼与其说是"建"在山坡上,不如说是"挂"在几乎垂直的陡壁上,这在建筑学上无疑是一个挑战。乃至当设计方案通过业主和政府机构的审查,在施工招标时,出于怕引发泥石流等担心,居然找不到承包商。最后,当地一家小建筑商终于接下了这个项目,施工费占了该公司年销售额的一半。

工程比预想的还要困难。在60度的斜面上建住宅,被认为是无视"常识"。但这种"常识"很快被颠覆:因地制宜,安藤采取把斜面削平之后深挖、将建筑"栽"人地下的工法。如此一来,限高(按日本法律,

山地建筑不得高于两层)和遮蔽率的问题 迎刃而解,六甲山集合住宅成了一个地上 二层、地下一层、加起来共十层的标准小 户型模范住宅社区。从远处看,这幢不大 的建筑,宛如在绿树掩映的山麓上故意安 放的一个由混凝土盒子和玻璃组成的装置 玩具,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惊人地融合,浑 然天成。

I期的成功,又先后引出了Ⅱ期和Ⅲ期。安藤的基于环境艺术的设计理念早逸出了单纯住宅设计的框架,发展为"造镇"的冲动。他把建地中的黄金位置都留给了公共空间。绿地、儿童乐园自不在话下,透过游泳馆、健身房的落地窗,可以眺望神户的街景。三个相毗邻的建设工程,把六甲山麓变成了一个梦幻般宜居的小镇。

1941年,出生于兵库县鸣尾滨的一个贸易商之家,典型的关西人。安藤是双胞胎中的兄长,出生后被过继到外公家,在大阪老街的长屋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直至外婆辞世。安藤从小有一种"海外志向",且越大越强烈。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的身份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不成想,这次旅行却成了其安藤厕身建筑界的契机。

高中毕业,立志献身建筑学的安藤一边刻苦自修,一边开始了孤独的世界之旅,足迹遍及欧、亚、非,从建筑中汲取人类的艺术、历史和文明。从接近北极的芬兰建筑中,体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摒弃所有冗赘的北欧极简主义建筑风格;从古罗马的万神殿,遥想充满戏剧性的"光

之空间";在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废墟中,思考"建筑的原点"。在印度恒河畔的贝拿勒斯圣地,安藤的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撞击,"足以改变整个人生观":

"在恒河中沐浴的人们身旁,火化的遗骸 顺水流过。这让我领悟到,自己的存在多 么渺小","人终归有一死,我要拼命按自己的方式去活"。

买来大学的教科书,把睡眠时间压缩到四小时,玩命苦读。在不为社会所承认的不安中度过了青春。"回过头来看,也许,起初看不到光明倒未必不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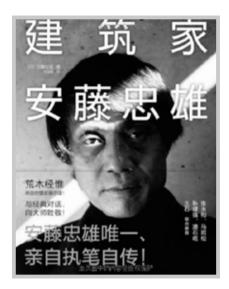


图1为六甲山集合住宅

件好事";"我的人生经历中,找不到可以称为卓越的艺术资质,只有与生俱来的面对严酷现实,绝不放弃,坚持活下去的韧性。"多年后,功成名就的安藤平静地回忆道。

如果说那次环球旅行使他做出了献 身建筑学的人生抉择的话,后来的两度美 国之行,则促成了其对日本建筑应走的道 路的思考,并初步确立了方向:"第二次搭 乘灰狗巴士,由西向东横跨美国,亲眼目 睹这个国家非同寻常的'富裕'。街角处挤 满手拿汉堡和可口可乐的人,在酒店或汽 车旅馆,擦手纸或面巾就像自来水般用之 不尽。我被这种大量消费的社会形态所震 慑,也感到在国土、资源与习惯上都迥异于 美国的日本, 却不断想效颦美国的空虚。" 对彼时在美国正方兴未艾的"时尚家居" 的生活理念,他认为:"在地狭人稠的日本 国土上追求这种生活毕竟不切实际,日本 社会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选择更符合自己的 生活形态, 在狭小的土地上, 寻找属于狭 小土地的富足。"

1965年,安藤的大阪市立公园设计方案入选一等奖。四年后,在故乡梅田开设安藤忠雄建筑事务所,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建筑设计生涯。此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安藤像彗星一样划过建筑界的天空,不仅在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列岛,而且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众多风格洗练、意味深长的现代建筑,迅速成为继丹下健三和矶崎新之后,代表"日本主义"(Japanism)的建筑大师。在素以学派林立、门户森严而著称的东洋建筑学界,安藤以工业高等学校



[日] 安藤忠雄:《建筑家安藤忠雄》,龙国英 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3月,88元。

(相当于中国的职高)的最终学历,不仅遍得日本和世界建筑艺术的最高奖项,而且在成为哈佛、耶鲁等国际顶尖名校的客座教授之后,于1997年出任在日本公认门槛最高的东京大学建筑系教授,一时间成为东洋社会耸动的话题。

安藤对建筑学的创造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念兹在兹的核心理念始终是"环境艺术"。最大限度地保存古建的固有形态,甚至不惜在结构内部置入"都市巨蛋"(Urban Egg),通过空间的实用功能的转换,以期达到保存古建"标本"的目的。作为一个有着浓厚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建筑师,安藤并不刻意以那些"纪念碑"式的大型公共建筑来自我标榜,甚至无意参与竞争。恰恰相反,他相当在乎住宅设计,力求在普通民用建

筑的设计上,融入人文要素,实现日本化的"诗意的安居"。

在安藤为世所称道的诸多创意中, 有一个被称为"清水混凝土"的建筑工 法。这种工法并非安藤的发明,很多海外 和前辈的建筑师都曾爱用不已,但却在 安藤那里实现了功能最大化和标准化。 安藤本人也承认,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直 接用混凝土做外墙材料时,不只出于美 学上的考虑,更主要的是囿于工程预算 上的限制,"内外墙一体成形的清水混凝 土,是最简单易行且节约成本的解决之 道"。虽说舍弃一切装饰,直接呈现材料 质感的美学,是初期现代主义的基本原 则,但何以让习惯了木材和纸张建筑的日 本人在面对冰冷的水泥时也能唤起的心 中的感性,是一个问题。

作为专家,安藤自然知道,要想做出 理想的墙面,就要在混凝土中加水,以提 升其流动性。可是,水分过多的话,也会 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因此,只能在灌浆过程中尽量搅拌混凝土,使其保持浓度均匀。为此,每到工地灌浆的那天,安藤会亲自加入工人的行列,一起手拿竹棒,疯狂搅拌,"每一次灌浆都如临大敌"。如此,平滑如砥、具有丝绸般质感的清水混凝土墙面,终于成就了安藤格物之美的品牌和颜面。

其实,这不仅仅关乎建筑设计。任何艺术,纵使观念再前卫,倘若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和"不精致,毋宁死"的作业实现其"物化"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清水混凝土早已成了传统建筑工法的今天,笔者在北京的798、草场地、宋庄等艺术现场亲眼见过无数清水混凝土的LOFT厂房、艺术空间,莫说"丝般感受",那种凸凹斑驳的"艺术呈现",让你连往墙上靠一下的冲动都没有。说句糙话:创意好,还得活细才行。尤其后者,是日本人的强项,也是东洋艺术最大的"秘密"之所在。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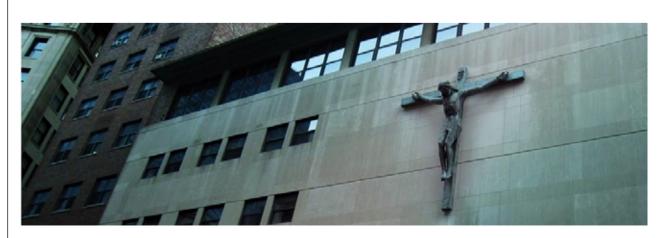
没有城管 但有牧师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_china@163.com)

X,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 从曾经到 现在,我非常喜欢台湾作家三毛,遇上她 的时候,正是我少年流浪之梦勃发时期。 在偶然读到她的《拾荒梦》后,我便将其 视为我的同好知己,你知道的,因为我也 有一个梦,不过我的梦不是拾荒,而是三 毛在重写的作文中提到的"街头小贩"梦. "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 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 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 飞鸟。"那时的我, 便常常梦想自己推着一 辆手推车,车上挂满了各种便宜且精致的 小物件,每天穿街走巷,向每一个路人推 销自己的小物件,路人当我是风景,我当 路人是风景。有时,这个梦做得无边无际, 在梦中我便以此为生,走遍天涯,成为天 下第一的地摊达人。

当然,你知道的,这个梦想是不能让

我爹妈知道的。他们倒没有对我的理想或 是长大了做啥有过什么过高的要求,但干 个体做小贩却是万万不能的。老爹是一位 公家人,在他眼里,只有公家人才是最理想 也是最体面的职业,而干个体摆地摊,不 是奸猾狡黠之人的损人利己, 便是没有出 路之人不得已而为之之事。此外,我那顽固 保守的父亲还认定,古已有之的"引车卖 浆, 贩夫走卒"之流所做之事, 不仅是"资 本主义尾巴"这种性质恶劣之事, 更是有 随时丢了小命而不知的危险之事。他不止 一次恶狠狠地打击曾经有过摆摊念头的老 吴:"你这种人去做这个,被人吃掉了都不 知道!"据说,如今在上海,"一跺脚,二瞪 眼,三掀摊子四罚款,不用问是城管"的黑 猫们已经武装到牙齿,装备了价格不菲、可 与防暴警察媲美的"钢铁头盔、防刺背心、 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四大宝。因此,虽然



在有了三毛《拾荒梦》的鼓励之后,我掩藏 在心底的地摊梦常常跑到嘴边,但却迟迟 不敢付诸行动。甚至不知何时,我的这个快 乐的梦想已经演变成如何与城管躲猫猫, 乃至于带上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然而, X, 你相信吗? 到波士顿没几日, 少年时代的地摊梦想竟然一下在心底复活。走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 广场地铁, 常常可以看见各式摆摊人, 或是推着铁板车卖热狗和冷饮, 或是拉着大木板车卖箱子帽子或是墨镜的, 或是摆上一块塑料布卖各种精致首饰的, 个个快乐的像天上的飞鸟, 于是, 我的地摊梦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 每天推着一个手木推车, 沿街叫卖着各种中国小物件, 一边在精致典雅的波士顿玩耍, 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 一边挣些银子做盘缠, 岂不两全其美! 于是乎, 我便日日跑到住所附近的哈佛广场进行"商务考察", 当然, 美国有没有城管是我首先需要确定的事情。

1

在美国,摆地摊似乎是一件既简单也不简单的事情。虽不像早先中国那样有八个大盖帽管一顶烂草帽,但也有交通部、卫生部、消费事务部等几个大盖帽来管着你。虽不像如今中国有着臭名昭著的城管追着跑,但在街头执法的警察背后却有着联邦法、州立法和地方法等好几层法律法规。虽然在美国人人都有摆地摊的自由,但实际上,美国街头摊贩数量和地点都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有着严格的数量控制和规定,比如,1979年纽约市长设定一般摊



图1为没有城管的哈佛广场

贩的营业执照数量上限是853个,这个上 限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导致申请者需要漫 长的等待才有可能拿到执照,其中退伍军 人和残疾人又会被优先考虑,因此,一般 申请者几乎要等上25年之久才有可能被考 虑发放执照。到了1992年,由于等待人数 过多,纽约消费事务部索性停止了新的营 业执照申请,要摆地摊的只能冒风险无照 出摊。食品商贩的营业执照虽没有数量限 制,但是食品商贩所必须的食品车的数量 却被限制在3000辆左右, 因此在纽约街 头,几乎有一半的摊贩是没有执照的。此 外, 在纽约, 许多地点和街道被规定为完 全禁止摆摊区域,在《纽约市行政法典》 中,被禁止摆摊的街道名单多达百余条,长 达20多页。即便在允许摆摊的地方,对于 每一条街的设摊时间, 摊点与路边的商店 距离、防火栓的距离、人行道的距离等都 有着明确的规定。据说在纽约市,哪怕是 在街头开罚单的警察也难以弄清楚这些关 于摊贩的法律法规。警察若是抓到违规摊贩,只是记下摊贩的名字,写明违反了哪些规定,然后交给地方法官裁决,因为只有地方法官才能弄清楚这些条例,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对违规的摊贩依法量刑。警察是没有权力裁决的,他们只负责交通、市容和公共安全。

与纽约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相比,波士顿无疑显得很袖珍,整个麻省总人口不到六十万,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摆地摊似乎比纽约还难,在硬着头皮读了几天Massachusetts和Boston政府官方网站的有关规定后,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依然弄不清楚我该如何申请执照,怎样才能在哈佛广场设摊。不过,我想,既然这种事情警察都难以弄明白,我何必为难自己。X,正如你所告诉我的,如果一件事不知道如何做,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我想,想知道如何在波士顿摆摊,最好的办法就是出一次摊。

在哈佛广场,有好几个地摊。地铁出口处,是一位墨西哥画家和他的画摊。这位墨西哥画家的特别之处是不用画笔画画,而是用装满各种颜料的类似灭害灵罐罐的罐罐,对着一尺来方的纸头喷画,然后再将画装上框,卖八到十美金一幅。这位快乐的喜欢喷各种日出的墨西哥画家,据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书,因为喜欢喷画,所以毕业后选择了四处流浪喷画为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这些是他用英文告诉我的,而我可怜的英文听力让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敢肯定,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说据说来的。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将这位墨西哥画家认定为我地摊生涯的领路人。

"哈罗,我想在这里卖一点中国小物件,我该怎么做?"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吃完早饭后,我背着双肩包,摇晃到哈佛广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刚摆开画摊的墨西哥画家问道。

"哦,你想卖什么?"墨西哥画家好奇 地问道。

于是,我拉开我的双肩包,将我想卖的东西鼓捣出来:四分之一块大红毛巾上别着的二十几个毛主席像章。"嗯,就是这个,毛主席像章,嗯……"我正想着该怎么用英语解释这些像章,却见墨西哥画家大笑:"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才想起,这位老外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完全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我能在这里卖这个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墨西哥画家叽咕了一大阵,见我依然有些茫然,于是拉着我,带我到地铁出口背面,在人行路边站住,指着地面说:"你可以在这里,知道吗?"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执照,如果我就这么摆,警察会没收我的东西或是罚我的款?"迟疑了一会,我终于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据我所查的信息说,美国警察是不会对摊贩进行强制执法,甚至很友好。而美国老百姓对于自食其力的小摊贩一般很尊敬,在华盛顿,一个以卖卷饼为生的美国小贩因心肌梗塞猝死,引起当地人自发的哀思,甚至《华盛顿邮报》头版也刊登了这位名叫卡尔洛斯普通小贩的讣闻与故事。

对于无照摊贩,善良的美国百姓会认为这 是因为政府工作不给力,没有提供更多的 工作机会造成的。因此, 若是对于无照摊 贩进行围追堵截,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小摊 贩,而是所有善良的美国老百姓,因为在他 们看来,这是断了勤劳而诚实的小贩的生 路, 剥夺了底层民众的谋生机会, 剥夺了最 基本的人权——生存权。《世界人权宣言》 第3条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 人身安全。"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任何人 都不能让别人活不下去。比如你或许听说 过的"柠檬水起义",在俄勒冈州蒙特诺马 郡,有一位单身妈妈带着女儿在街头卖柠 檬水,由于没有卫生许可证而遭到卫生检 查员的驱逐,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在 街头摆设了更多的柠檬水摊位,最后地方 最高长官打电话向给母女俩道歉事情才算 了结。不过,虽然有着美国民众撑腰,但我 依然不放心, 毕竟, 美国警察就是中国的城 管。X,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 成龙大哥所说的中国人欠管还真对呢。

"没关系,"墨西哥画家哈哈大笑, "没关系,如果警察过来对你说,不要在 这里摆,那么你走就可以了。"

"警察不会处罚我吗?"我继续确 认。

"不会,他们最多告诉你,这里不能摆,那么你就去别的地方。"墨西哥画家再次确定。

"谢谢!谢谢!"在再三道谢之后,我 将双肩包放在地上,把那四分之一块毛巾 放在包包上,然后将一张纸头夹在毛巾边 上,上面写着:¥5for1。这些是我昨天晚 上准备好的。在决定在哈佛广场支个地摊后,我一直为卖啥而大伤脑筋,不止一次将自己带来的两个大包掏了出来,但始终也没有掏出一样比这些领袖像章更合适的东西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毛主席像章,是我在复旦大学步行街附近的地摊上,从一位老头那里2元一个收购而来的。收拾行李来波士顿时,偶然发现了自己收购的这些像章,突发奇想,若是带去波士顿,说不定能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能遇上一个趣味古怪的老头,卖上一个好价钱,那滋味想来不是一般的好。于是,我得意洋洋地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收进了行李箱。不过,令我郁闷的是,去了哈佛大学好几次了,竟然都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

不过,那会儿,我可庆幸自己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这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地摊梦想,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块毛巾大的地摊,虽然在十分钟内路过的二十五个行人中只有三位行人注意到这个小地摊,但对于我来说,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坐在双肩包后面,仿若我是世界的焦点,兴奋得像在打摆子:若是没有人注意我的小摊,我会用热切的眼光迎接每一位路人;若是有视线落在我的地摊上,我立马变得害羞起来,挂上"摊主不是我"的表情。

就这样,我在哈佛广场打了近两个小时的摆子,有几次,警察离我最近的距离不到十米,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没有我对他们的兴趣大。在再三确认这些虽挂着真枪实弹的黑猫们没有披挂"四宝"之后,城管的阴影彻底在我心底消除。然而,一种无依无靠的遗弃感却渐渐涌上心

头,因为两个小时内,几乎没有人为我的地摊停下来。只有一个人把脚步放慢,对着同伴说了句:"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卖。"显然,这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同胞。仅仅五秒之后,我只能坐在地上,以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激励自己鼓足干劲坚持将练摊进行到底。

2

X. 你知道吗? 许多年前, 我那年轻 而帅气的外公,与许多逃荒到上海的苏北 人一样, 在虹口区一带做过好几年的游动 小贩,卖货郎、膨爆米花、人力车夫、船工 等等,大抵那会儿苏北人在上海做过的事 情,我的外公都做过。勤劳的外公正是靠 这个, 养起了苏北老家的三个弟弟, 甚至有 一段时间得意地脱下马褂穿起长袍,回老 家用大花桥娶了我外婆。许多年后,我竟 然在家里的柴火间发现了外公那时留下的 用来膨爆米花的、像一颗大子弹似的黑黢 黢的锅。我惊讶极了,这个几乎是我家四个 丫头年龄之和的子弹锅是怎么从上海到苏 北然后又辗转出现在江西深山里的呢? 这 个子弹锅又是怎么伴随我的外公从旧中国 走过新中国,经历大灾荒、大灾难而完好 无损保存到改革开放的呢? 外公只是笑, 他从不说自己的故事。但显然外公很激 动,再三检查这口黑黢黢的子弹锅,确定 这口老黑锅无需再培训便可再上岗后,竟 然想重操旧业。当然,外公的想法遭到了 全家人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 角度的全面否定,并总结出一个符合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论断——总之,

这种走街串巷的旧技艺应该自行消失在旧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于是,有着十八般好手艺的外公只好舍下这门手艺,抚着老朋友喟然长叹。

X,或许你的外公和我的外公一样, 和那个年代的老头们一样,为生存奔波迁徙了一辈子。面对他们,我常生发出"我有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尤其是每次回家,我的外公和我的家人总是把我当做大功臣似的迎接,洒水扫门、杀鸡宰鸭,难道仅仅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位所谓的"读书人"吗?可惜,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只能忍痛割书做贩妇了。据说,爱因斯坦在75岁回顾其一生的时候说:"如果我



图2为作者自制小推车

能回到从前,而且必须决定怎样谋生,那 我不会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学者或老师, 我宁愿做个水电工或摆地摊的。"我不知 道爱因斯坦是出于什么心境说出这种话, 但想到爱老人家都有摊贩情结,我便不得 不正视并重视起眼下我这份自由且务实, 并带着草根快乐的职业来了。

首先,我发现再也没有比波士顿更 适合做游动小贩的城市了。若是按简 雅 各布斯的标准,波士顿便可谓她的理想之 城。前几年,她的一本旧书《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在国内出版,可惜,只在小小的文 化界几张报纸上热闹了一下便一闪而过了, 我们的城市根本没搭理她的警告,依然在 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拆拆拆,依然照旧往死 里奔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其实,简雅 各布斯的这部经典之作出版于1961年,当 时的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更 新"计划,以振兴衰败的城市中心地带。 许多专家总是将如今在中国进行得轰轰烈 烈的旧城改造计划与美国的这个时期"城 市更新"计划相比,似乎给汽车修建越来 越宽和越来越直的马路、给老百姓修建越 来越高和越来越深的楼房是一个毋庸质疑 "国际惯例",毁掉一个城市的过去以便 豪迈地奔入现代化是一个必须的"国际惯 例",结果当然是,按"国际惯例",中国的 城市也正一个一个掉进现代大都市的深 渊——交通、安全、能源、人性都陷入危机 之中,只是按中国惯例,我们的城市还多 了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飞涨的房 价。闭嘴闭嘴, X, 不好意思, 我又激动了, 因为我想起了城市没有让生活更美好的上 海,和我刚刚失去的在上海的房子。嗯,其实,在我看来,将中国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有着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味道。

不过,对于简 雅各布斯所提出的有 关城市规划的建议我依然心向往之。记 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城市最根本的内 涵就是要符合人性化的生存与发展,或许 因为是女性吧,这位我第三喜欢的美国女 人简 雅各布斯似平更注意日常生活中 城市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与需要,而不是脱 离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工程。或许在许多 "大男人"看来,她的一些建议简直就是 妇人之见,比如她非常强调人行道、传统 小尺度街区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她 认为一个城市的大多数街段"必须要短, 在街道上要很容易拐弯",因为这样的人 行道除了承担马路之间的交通功能外,还 能满足人们"安全""交往"的需要,成为 孩子们戏耍的天然乐园。再比如,与她的 人行道理论相关的,她认为一个城市的 公园和广场, 壮观的景色或是旖旎的景 色只是一个附带作用,并不能起到必需物 品的作用,只有能起到某种不可替代作用 的公园和广场才是成功的。又比如,对于 蚕食了美国各大城市的汽车, 她认为提 供给汽车的空间越大,汽车反而会更多, 因此,她主张反其道而行,通过缩小马路 空间、建设短小的街区、强化公交运输 等,通过城市本身的作用来限制汽车的扩 张。再又比如,简 雅各布斯说:"城市 的过程是本质的东西",因此,她主张一 个地区应该有一定比例的老建筑,独具匠

心地对旧城进行改造,而不是简单的模仿 和过度的竞争,从而保持一个城市的活力 与多样性。

X,只要你在波士顿呆上一天,你就会 发现简 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原则 竟然在波士顿得到几近完美的实践。短而 弯曲的街道、频繁而简朴的小店、与城市融 为一体的公园与广场、四通八达的地铁与 公交、宁静而优雅的查尔斯河、随时会给你 一个灿烂笑容的路人、诉说着美国两三百 年历史的建筑,穿梭在美国这个最古老的 城市中,让我觉得拥有一辆汽车简直是对 这个城市历史与风景的侮辱与浪费,在我 看来,在这个城市中呼吸与行走,最好的方 式莫过于做一名沿街叫卖的小贩。

X, 你知道吗?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中,简 雅各布斯将我这种流动摊贩 以及路边的小摊贩小业主小企业家称之为 "街道中的眼睛" (Street Eyes)。传统小 街区老城市中,各种小企业主小店主的存 在以及我这种流动小贩的存在,不仅给附 近居民与城市陌生人提供了使用人行道的 理由,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典型的安宁与秩 序的坚决支持者","如果数量足够多的 话,他们是最有用的街道监视者和人行道 护卫者。"简 雅各布斯甚至称之为即兴 的人行道芭蕾,在这种舞蹈艺术中,"每个 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 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相 互和谐的整体。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 人行道'芭蕾'每个地方都不相同,从不重 复自己, 在任何一个地方总会有新的即兴 表演出现。"

也就是说,按简 雅各布斯说法,我 在哈佛广场近两个小时的"打摆子",不仅 充当了这个城市的眼睛,守护着这个广场 的安全,还可以说是一种即兴的芭蕾艺术 了,想到此,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 地摊也未免太寒碜了些。若是早知道我要 在这里摆摊,我一定会去义乌小商品市场 走一趟,弄一些全棉的袜子、小巧的丝巾、 精致的小钥匙扣手镯手链或是典雅的小扇 子过来卖,在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中, 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广场上,努力建设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摊,即兴表演我 一个人的人行道芭蕾艺术。

3

"嗨, sisi, 你在这里干什么?"突然, 一句亲热的招呼将我的地摊畅想曲终止, 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西班牙牧师。他是我到哈佛广场第一天溜达的时候认识的家伙。那天, 我围着广场打转, 走了一圈又一圈。我每走一圈, 站在路旁的他就会给我一个灿烂的招呼。走了几圈之后, 我便和他成了老朋友, 但实际上, 我既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西班牙人, 也不能确定他是否是牧师。只不过因为他总是站在美国银行门口, 散发着有关《圣经》的小册子, 小册子都是英文西文双语的, 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 只是在私下里我称他为西班牙牧师。

奇怪的是,陌生的西班牙牧师的亲 热招呼,一时之间竟让我有他乡遇故知 之感,不禁悲喜交集。我一把抓起我的地 摊,比划了好半天,才让他明白,我正在 练摊呢。 谁知这位和善的西班牙牧师却收起了笑容,对我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你要有执照。"

执照,执照,我当然知道我需要执照。可是我去哪里申请呢?我瞪着两只无辜的眼睛看着牧师。牧师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边画地图一边说: "我本来可以带你去办执照的,但我今天有事,你可以自己去市政大厅申请。"

X,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有些撒谎了。其实,在我练摊的前一天,我就去市政大厅申请执照了。不过,我去的不是牧师在笔记本上给我画的、哈佛广场所属的剑桥镇的市政大厅,而是去了波士顿的市政大厅,并领了一张"business certificate"申请表格。在波士顿,申请一个这样的执照简单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在市政大厅的city clerk's office里,我对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摆一个地摊。我还没来得及拿出我的护照证明我的身份,热情的工作人员便给了我一张表格,一张A4纸大的表格。我只需要填上我想卖啥和在哪里卖,以及我的联系方式,最后签名便ok了。当然,还需要缴费,四年50美金。

我拿出我的护照给工作人员看:"我的这个签证可以申请吗?"

"可以!"工作人员把表格翻过来, 反面写着如果是非波士顿居民,再加25美金,也就是说我交上75美金就办好了四年的执照,一切就OK了。X,你知道吗,当时我竟然有些失落,因为我做好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心理准备竟然一下无用武之地了,要知道,如果在国内,按照《城

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城乡个体 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个体工 商户登记程序规定》的规定,申请一个摊 贩营业执照需要提供所在地户籍证明及其 他有关证明,卫生部门许可、其他部门批 准文件,有关资质证明,部分行业还需要 提交公安局的审查同意证明等许多让我摸 不到头脑的语焉不详的证明, 若是没有本 地户口,那提交的文件和证明简直浩瀚极 了, 如在北京, 外地人要申请一个个体营业 执照,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和暂住证;户 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 的营业执照或者出具的进京经商证明;经 营场地的合法证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学 历证明: 育龄妇女必须持有暂住地计划生 育主管机关核发的《婚育证》;申请从事职 业技能服务的,必须持有国家认可或者本 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职业技能服务 资格证书, 凡不具备上述证件、证明材料 的,一律不得核发营业执照。而在这里,我 仅有的一个身份证明——护照似乎都用不 上,事情简单的让我疑窦丛生,拿着表格 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一 张固定摊点的营业执照申请表格,而我需 要申请的是游动摊贩的营业执照。在我用 蹩脚的英语重复几遍之后,工作人员终于 明白我的意思了:"哦,那你应该到州市政 大厅去申请执照。"接着,工作人员为我划 了一张如何到达州政府的路线图。原来按 照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固定摊贩是地方县市事务, 你需要先申请 到固定摊位,确定自己在哪里设点摆摊, 卖什么东西, 才好来申请执照。而沿街叫卖



一天之内有可能走过七八个县市的流动摊 贩则归州政府管理。

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在州政府大厅的 消费事务部办公室领到了另一张执照申请 表,表格依然只是A4纸大下,正反两面, 我需要填写简单的个人信息和我的货物 种类即可,但不同的是,在这张表格下方 有一栏需要我所住的地方警察局的chief of police的签名,以证明我"is of good repute for morals and integrity"。耐心 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警察局拿到签名再 回来,交上62美金,当场我便可以拿到这 张有效期一年的执照。"然后,你就可以在 麻省任何地方卖你的东西了。"工作人员笑 眯眯地告诉我。

不过,如果我是卖食物,则需要到卫生部办理卫生许可证;若是买鱼或海鲜食品,则还需要去海鲜食品部办理零售许可证。但实际上,我实在想不出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卖。X,来波士顿,我只是觉得很闷,想出去走走,从未想过在波士顿摆地摊。那几天,我将随身带的东西倒腾了好几遍,也只有那四分之一块毛巾的领袖像章可以摆到地摊上。因此,我没有去警察局签字,也就放弃了办理这个执照。因为若是按成本计算,62美金办理的执照我只卖四分之一块毛巾的像章,成本未免太高。因此,我选择了无照出摊。

但那会,面对正直的西班牙牧师,我 心中确实感到羞愧。随后我发现,即便有 执照,我也不能在哈佛广场出摊。在我再 三承诺立即去剑桥镇的市政大厅办理营业 执照后,西班牙牧师脸上立即轻松起来, 笑眯眯问我:"你准备卖什么东西?"

于是,我把手上的四分之一块毛巾展示给牧师看,谁知,牧师一看,脸上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你不能在这里卖这个,在哈佛广场摆摊的都是艺术家,你卖的东西必须是你自己做的,明白吗?"接着牧师指给我看,在墨西哥画家斜对面街口的那位妇女卖的是自己的刺绣,旁边不远处是弹吉他卖唱的,再旁边又是一位画家。"他们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明白吗?"

这时我才想起在州市政大厅领到的流动摊贩营业执照申请表上,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明,所有的执照还得受地方法律法规的限制,这就是说,虽然在理论上我可以在整个麻省穿街走巷,但实际上,我还得受制于麻省各个县市的地方法规,我必须清楚每一条街道是否允许设摊,以及设摊的时间,貌似最自由实则最不自由了。

X,或许你会奇怪,墨西哥画家为啥会让我无照支摊呢?这不是违法的吗?其实,我当时也奇怪,到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美国,摊贩按照其贩卖的货物分为一般摊贩、食品摊贩和第一修正案摊贩。前两种摊贩必须申请相应的营业执照,而一种摊贩则不需要营业执照,因为他们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这类摊贩的出现,还得回到纽约。1996年,一群在纽约街头摆摊销售自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由于没有执照常常遭到警察"城管"而向法院起诉,认为《纽约市行政法典》要求贩卖书籍、期刊、艺术品等商品的摊贩获得营业执照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法院最后裁决,该条法律

确实违反宪法,从此,凡是贩卖受到宪法 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商品的摊贩不需要营业 执照。(有趣的是,也正是在1996年,中国 开始出现"城管",开始了与小贩的生死博 弈。)因此,墨西哥画家是无需执照的,他 正在行使他的自由表达权。只要不妨碍公 共交通,任何人都不能"管"他。我想,他 肯定也是把我归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的摊贩了吧。

但严肃的西班牙牧师可不这么认为, 他还执意带我到对面马路那位卖刺绣的大婶帮我问个清楚。然后,牧师认真地看着我:"哈佛广场只允许艺术家卖他们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我很认真地对着牧师点头:"谢谢,我 知道了。我这就去市政大厅。"

旋即,我便骑上十美金买来的二手 自行车,去剑桥市政大厅了。X,其实这 时我已经放弃摆地摊了。但我依然兴致勃

勃地跑去了市政大厅,因为我发现,美国 政府公务员是绝佳的锻炼英语口语与听 力的对象,他们的耐心和容忍让我第一次 看到了人民公仆的内涵, 让我喜欢上享受 做主人的权力。在剑桥市政大厅询问的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市政大厅只负责营 业执照的问题, 若是问他们具体能在哪里 设摊,他们也只能有礼貌地说不知道,然 后再祝我good luck。于是,至今我依然 没有弄明白,如果我想成为一名街边固定 摊贩,如何才能申请到一个固定摊位?一 次, 走在Washington大道上, Maggie 告诉我,波士顿市中心黄金地段的街头 固定摊位,一般也只考虑退伍军人和残疾 人士。新的申请者需要排上十几年的队。 这似乎意味着我即便申请到营业执照,也 不太可能有一个街头摊位,只能去申请大 型室内市场中的小摊位。如Faneuil hall marketplace, 随时都可以在南楼四楼的



图3为波士顿的圣经小书摊

他们会根据申请者的资金、卖的货物以及 发展前景加以考虑批准。不过,在那里,哪 怕是最简单的一辆大板车的摊位租赁价格 都不菲,而好的门面每月租金高达数千甚 至上万美金。唐人街的珊姐警告我,千万 别去做老板,既累又苦,挣的钱还不如打 工仔,甚至不如在唐人街洗碗。珊姐移民到

波士顿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她的话让我彻

底放弃了地摊老板娘的梦想,哪怕只是四

市场管理办公室递交摊位申请表格,每年

分之一块毛巾大小的地摊。

好在我心仪的是流动摊贩,可是,流动摊贩是否可以任意穿梭在整个麻省的大街小巷,"自由快乐的像天上的飞鸟"吗?这个问题,我至今还弄明白,甚至不知道该问谁?这让我的地摊梦想变得有些飘渺了。两个多小时的地摊生涯,我似乎只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在波士顿,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X, 我很想你。Q



温暖的景深

北井一夫视野中的北京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北井一夫(Kazuo Kitai)集中拍摄 过两次北京。第一次是文革后期的1973 年,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前后相差二十 年。作为1944年出生于伪满洲国鞍山、战 后在襁褓中归国的日本人, 北井无疑是有 大陆情结的人。尤其是对北京,这个以青 砖灰瓦的四合院、错综复杂的胡同和路旁 古老的街树为符号的城市,令人感到敦厚 踏实,用其母的话说,人走在街上,"就跟 走在梦里似的",胸口会一阵阵发热。

1973年4月,为纪念中邦交正常化, 以前辈摄影家木村伊兵卫为团长、由十一 名日本摄影家组成的参观团应邀访华,北

井和另一位著名摄影 家篠山纪信得以躬逢 其盛。两周的时间走马 观花,在京、沪、穗等 地,把那个特殊时期 中国百姓的生活拍成 胶片。回国后,木村、 北井和篠山三人的作 品在权威杂志《朝日摄 影》(Asahi Camera) 上以超大篇幅特集的 形式发表,引起强烈反

响。在中国信息稀缺的时代,那些身着清 一色"人民服"的男女老幼及其在"广阔 天地"战天斗地的"原风景"深深吸引了 西方读者的视线。

北井后来在自己的摄影集中回忆道: "作为大国中国的首都,北京出人意料 的寂静。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理解,那寂 静是文革造成的。"与同一时期来华的西 方摄影家(如意大利摄影家安东尼奥尼 等)相比,北井镜头里的中国,题材比较 日常化,人物多有自然表情的流露。无论 摄影家有意或无意,从作品中能明显感 到某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或许可以



图1为1998年 东城区美术馆前

ART



说,只有当摄影者有意识地把域外风景 作为"异文化"(而不是"次文化"或"亚 文化")对象,并发自内心地向它致敬时, 其镜头才可能像滤光片那样,最大限度 地过滤掉意识形态的"色调",呈现文化 本身的姿态。

1993年,摄影家二十年后重新踏上 北京的土地,除了王府井街头多了家麦 当劳之外, 尚感觉不出太大的变化。但其 实,彼时,社会转型的动力已然成形,正 蓄势待发。随后,这个城市深陷于极度的 经济迷狂之中,简直"像日本七十年代的 高度经济增长和八十年代的泡沫突然间一 块到来似的",曾几何时令摄影家的母亲 迷恋不已的梦中依稀的古都,在史无前例 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所扬起的烟尘中, 开始 迅速褪色。后来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目击 的那样,以平均每年消失六百条胡同的速 度,北京蜕变成了一座新城。2001年底,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岛回到阔别十三载 的故地,他发现:"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 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 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 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对这样一个行将湮 没的城市文明,北井的摄影集《1990年 代,北京》不失为一个深情的回望,一曲 萦回的挽歌。

与文革后期的北京相比,摄影家镜头



图2为1996年 朝阳区香河园街

D ART

中九十年代的北京,题材更加日常化,甚至透着一股子老北京寻常巷陌的油烟味,有些作品的视角相当本土,足以"乱真"。与同时期拍摄过北京的马克 吕布等西方摄影家明显不同的是,北井并不刻意去捕捉、表现戏剧性的瞬间,他只在乎人物的状态:从发自内心的笑,到专注于某件事的神情。而从构图的均衡和谐、对画幅中垂直线条的绝对标准的执行上,则令人联想到摄影家早年的美术理想。像卡蒂埃—布列松一样,有过画家梦的摄影家,往往更重视构图,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在北井开始走上摄影道路的六七十年代,正值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摄影被称为"都市论",仿佛照相机只配表现

都会文明似的,几乎所有的摄影家都把 焦距对准了新宿、涩谷一带繁荣的街区 和摩天楼。然而,东京出身的北井却对此 偏不感冒,反而以拍摄城市化进程中日益 凋敝的乡村而著称(如反映围绕成田机 场征地问题,农民旷日持久的维权斗争的 《三里冢》等)。不成想,如此讨厌都会 的摄影家到了中国,竟深深地为北京所 吸引。他以温暖的景深和诗意的曝光为 我们"截图"的、一个城市的既有文明在 行将遁形前的"决定性瞬间",不仅是艺术,而且是见证。



如果希望向前走得更快, 必须时常回头看看

——专访君特·施鲁施彻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2011年是柏林墙修建50周年的纪念。1961年8月12日,东德政府通过法令,为防止居民大量流入西德而修建了这道墙。在8月12至13日的夜间,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的日出之时,一道混凝土防线已经初具规模。柏林墙的修建不仅是为这座城市筑起了难以逾越的屏障,也为德国人的心灵筑起了高墙。如今,50年过去,德国人如何看待已经不复存在的柏林墙,他们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存对柏林墙的集体记忆?每个人都看得到的,是不久之后将举行的50周年纪念仪式,而潜藏在德国人记忆深处不易为人所见的,则是对待历史的客观与审慎。

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创建者君特·施鲁施彻 (Günter Schlusche)是建筑家、历史学者,同时,他也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纪念馆的负责人。



问:柏林墙修建前,东西柏林地区的人们是否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裂或隔阂?

施鲁施彻: 首先要说的是, 德国的情况不像是北爱尔兰或者印度和巴基斯坦, 它不存在民族矛盾的问题。所以柏林墙带来的隔阂更多的不是民族意义上的, 而是实际层面的。我可以举个例子, 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以后90%的教区都在西柏林, 只有大约10%在

东柏林,也就是说,东柏林的大部分人没有 去教堂的机会。在柏林墙建立以前,每天出 入东柏林和西柏林边境的人达到了50万人 次,因为有不少人住在东柏林,但在西柏林工 作,或是相反。不少人的朋友、亲人、伴侣都 是分开在东西柏林两地的。虽然两个地方有 着不同的货币体系、政治制度,但总的来说 它们是一个整体的城市,只要带着过境的文

TALK TALK

件并办理一定手续,在东西柏林间穿梭并不向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其实,西柏林对东柏林人来说不言而喻是有吸引力的,那儿有很多商店,能买到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电影院里播放着人们爱看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而东柏林也有它吸引人之处,例如,那儿的物价很便宜,不少西柏林人会到东柏林采购面包、土豆、蔬菜等等食物。总之,你有一大把原因前往任何一边的柏林。

但是在柏林墙树立起来以后,事情就大不一样。城市分裂了,柏林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东柏林人被严格限制进入西柏林,当局只对那些75岁以上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放宽限制,因为这些老年人已经不存在叛逃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的人被严格限制通行,这产生了很多悲伤的故事。例如,如果一个西柏林男人有一个在东柏林的妻子,这意味着他们两人没法再在一起,如果想见面,他们只能向对方写信,或者申请到东西柏林边境,运气好的话,他们能隔着柏林墙之间200米的距离向对方挥手。

问: 上世纪80年代末拆除柏林墙的时候,似乎德国人并不希望保留它,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

施鲁施彻: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已经存在了20多年的历史。当时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政治家,人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们已经受够了,把它拆了吧。到了1989年柏林墙即将拆毁的时候,距离它最初的建设已经过去28年,当时,有许多国外的投资资本

进入了柏林,因此,人们把柏林墙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障碍,也将它视作德国统一的障碍,因此越早拆除越好。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会在当时考虑要不要保留柏林墙,甚至重建其中的一部分,让它告诉西柏林和东柏林的人们,这堵墙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声音很微弱。在地方层面,很多居民出于个人感情原因是希望快速而彻底拆除柏林墙的,这使得柏林墙的保护和纪念工作在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顺便说一句,柏林墙的拆除工作主要是 东柏林军队做的,东柏林的军人最初是柏林 墙的保护者,后来,拆除柏林墙又成了他们 最后的工作。

问: 但是, 为什么又在后来选择保留柏 林墙, 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

施鲁施彻:如果不记住这些墙,你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柏林这座城市。想要在记忆中保存这堵墙,你不得不保留下某种实体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历史需要目击者,这样历史的印记才能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同时,这堵墙也见证了东德曾经有过的独裁历史,向人们展示了极权主义是在东德是如何运转的,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

但我也想特别提一句,关于柏林墙保护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由于东柏林人和东德人最早提出来的。现在,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数量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声称,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推进公民社会的革命,才最终推到了柏林墙,因此,他们希望向后代的





德国人展示,是谁改变了历史。在德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公民社会的革命成功推翻强权,实现了两德统一,最重要的是没有付出暴力与流血的代价。柏林墙就是这一切的见证。所以我经常说,柏林墙不不仅仅是政治压制的象征,它在今天也是反抗强权、国家统一的象征。

问: 但是你们选择了用一种不甚张扬的 方式来保存记忆和纪念,这和许多地方的人 们纪念历史的方式都不一样,为什么?

施鲁施彻:我们对待柏林墙的态度是, 首先,虽然大部分墙都已经拆除,但我们仍 然不想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任何重建。保留并

尊重历史的原貌,这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但 是,纪念一个已经消失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决定寻找到一个重新展现柏林墙 的方法。为此,我们邀请了国际上知名的设 计家、建筑家、艺术家进行一次公开竞标,研 究如何重新展现柏林墙的历史和意义,而不 是在事实上翻修柏林墙。我们最后选用了将 生锈的钢筋沿着柏林墙的遗址排列的设计, 模仿了柏林墙内部的钢筋支架。我们并不会 按照所谓的历史原样,把柏林墙重新给人们 看。我们的任务是让人思考这段历史,我们 希望这座遗址对于参观者来说是"可读的", 而不是为来这里的人们修建一种廉价的快餐 式的纪念碑。对于历史,读者自己会有解读, 你只能帮助他完成这种解读,而不是替他进 行解读。

因此,这个遗址,以及我们的犹太大屠 杀纪念馆等等很多地方的历史纪念遗址,都 是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它们建立在城市的公 共场合,人们随时可以进入其间,思考、交 谈,甚至进行一次野餐,所有这些都是被允许的。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纪念方式 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快餐式 的廉价纪念。柏林墙在他们眼里是一种恐怖的象征,因此,他们会批评我们没有把这里 弄得更有恐怖气氛一点,他们会建议:为什么不重建当年东西柏林墙中间地带的那些碉堡、灯塔、铁丝网、机关枪?最好还添几个开枪射击人群的东德士兵。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毫无意义。我们希望的是向人们解释历史,而不是向人们传达恐怖。

问: 那么, 德国的年轻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 柏林墙对他们还有吸引力吗?

施鲁施彻:让柏林墙拆除以后的时间里 出生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我们很重要 的工作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吸引年轻 人的注意力是一个问题。柏林无论在经济和 文化上都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对于欧洲 的年轻人来说,这座城市不乏吸引力。我们 也很高兴地看到,相比于年轻人经常去的其 他地方,这些年参观柏林墙的人群平均年龄 在下降。换句话说,越来越年轻的人在关注 这段历史。

当然,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学校组织的参 观。在20岁以下的年轻参观者当中,基本上 都是属于学校组织,这在我们的国家是一种 强制行为,对于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有严格 规定。这些孩子生活的时代距离冷战时代已 经很遥远,他们在感情上也对于冷战时代并 没有任何概念,因此,比起德国的中年人来 说,完整地告诉他们这段历史会更加困难。 不过, 迄今为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做的还算 成功, 而在20到30岁的人群中间, 有更多的 人是自发来到柏林墙的,实际上,我们更希 望来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也能够 经常来柏林墙看一看,铭记这段历史,但这 些人通常从他们的国家来到柏林只是为了购 物。但是,我想,对于德国的年轻人来说,柏 林墙的意义直接而明了: 这是我的国家, 因 此我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各个侧 面。对于前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 尤为重要。

问: 有一种甚为流行的思想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只需要往前看就行了。如何看这种观点?

施鲁施彻: 在德国, 或者说欧洲, 这同 样是不少人持有的一种思想。那就是,向前 走,别回头看!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如 果希望向前走得更快,那么它必须时常回头 看看,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径,不至于丢 失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不过,在德国情况有 些特殊。来自前东德地区的人们心里始终 会有一种与西德人不平等的感觉,虽然前东 德的经济和政治在现在看来都是一种失败, 但是东德人却长期把西德政权视为某种殖 民政权,另外,两德合并后产生了不少"失 败者",他们对于现状也并不是那么满意。 比如教育系统,合并之后,东德有近一半的 教授有教职不保的危险。合并后的争议还在 持续进行中,毕竟,两德的合并其实并不是 事实上的联合, 而是一个并入另一个, 准确 地说,是东德合并到了西德,人们当然应该 对此进行反思和批评。在合并之后,前东德 地区的经济获得了明显的进步,人们确实赚 到了更多的钱,变得更富裕了,这是东德和 东欧那些脱离了共产主义的国家最大的不 同,前东德人对于东德有某种认同感。例如 柏林墙,他们为此感到自豪,认为是前东德 地区的民主运动促成了这个事件的发生,最 后推垮了柏林墙。有时候,这会造成人们对 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在现在的德国,确实有 类似于左翼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他 们把自己视为东德传统的保护者。当然,客



观地说,我们目前的社会也存在着不少借鉴 自社会主义的东西,比如公共医疗系统就 直接取材于东德的样板,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换了个名字。**○**





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

——专访马勇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 lingzi0815@gmail.com)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

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 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 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



辛亥可能给未来中国以警醒

问:这本书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很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马勇: 我也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三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我们现在走的是后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也不经意办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坏事。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则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

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 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 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 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 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我在 微博上也讲过,一定不要宣扬改革的恐惧, 要强调,只要政府高层下决心改革,一定会 获得人民的支持。真正不支持的就是中层官僚,因为改革了,他们就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 了,或者空间将被极大收缩。

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到20年 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 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 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是根本没起 步嘛。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 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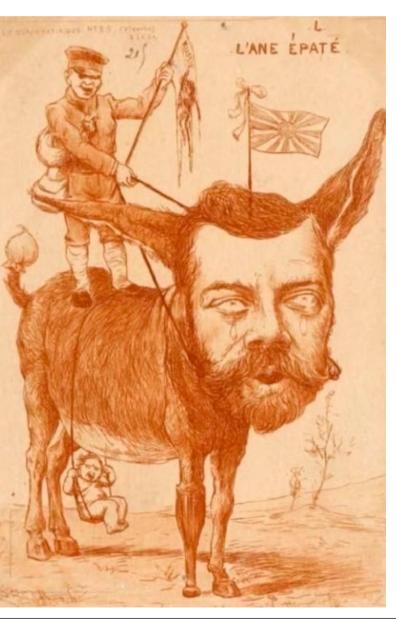
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

问: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

马勇: 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由此也证实革命党人多年来对清廷立宪不信任可能是真的,促使

这些立宪党人转向革命。如果第一届责任内 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 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

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就 像今天的高干子弟,毕竟在今天的社会里, 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 见识 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 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 要考虑的。



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 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 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 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 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 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

问: 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 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 渺茫。

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 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 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做革命的高 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这解读就不对。黄花 岗起义就是没办法的时候破罐子破摔,要打 鸡血,给自己鼓舞。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 这个原因。

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 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 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 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 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 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 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这在过 去一百年没有人敢这么讲,谁会说吴樾是中 国式恐怖袭击? 但我讲的确是历史。

问: 你给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 认为它 超越了法国大革命, 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 这怎么理解?

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

访谈 TALK

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一百二十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 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 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 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 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 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 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 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 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 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 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三天,当时完全可 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 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 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 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 将领都是这个原则,尽量不扰民。

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们过去就有一次是不对的,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国内外都在呼吁停战,国民党在南方,共产党在北方,最好能进行南北和谈,建立联合政府。如果当时能像辛亥一样达成某种妥协,我们今天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

将剩勇追穷寇"啊。

问: 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 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

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到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当时国内主流社会是民主体制,只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因不满于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在南方创建临时政权以与北方对抗。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

总体来说,1912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 命党人在中国前途和发展问题有不同看法。 他们一直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另外他 们身处南方,与北方一直有冲突。孙中山认 为宋教仁案是袁世凯干的,认为袁要摧毁民 主架构、走向独裁。历史恰恰是, 袁世凯不 是独裁,而是直接返回了帝制。这证明了孙 中山"反袁"的正确性,增加了他政治上的 自信,南方崇拜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1916 年开始,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搞了几次。不 过这些都不是正面冲突, 因为北洋政府管制 达不到各个省,南北之间正面的军事冲突在 那些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展开。北方的军阀陷 入混战,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也就有机会 偏安一隅。当然,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统 治区域也不大,主要就是广东及周边几个省 份, 时分时合, 并不稳定。而且南方政府内部 也有几次火并,像过去一直说的"陈炯明叛



变",现在看来可能还有重新讨论的空间,因为陈炯明的意思就是要和北方谈判,达成妥协,实行地方自治,所以要打发走孙中山。

问: 在你看来, 袁世凯为什么后期走向帝制?

马勇: "二次革命"之后,中国有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内部政治架构从帝制一下到了民主,管不了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就发表了谈新教育政策的文章,说我们既然身处共和时代,所有帝制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不适用了。比如忠君,君都没有了,怎么忠?但是很快,社会伦理观念出现了问题。没有皇帝,中国人找不到感觉。因为多年的帝制统治让国民有心理的寄托,老话讲"皇恩浩荡"。现在我们看英国王室,觉得莫名其妙,皇子结婚至于这么盛大吗?其实我们过去也是一样的,光绪帝1888年大婚的时候比这个还厉害。当时为了庆祝,全国公职人员放假好几天,全国免税。这对国民来讲就是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心理维系。

1913年宋教仁案之前,黄兴就给袁世凯 发电报,讲应该重新提倡一些儒家伦理。章 太炎1913年到北京来,与袁世凯谈到称帝, 也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当时蒙古在俄国 的策动下要脱离中国,章太炎就说,你老袁 如果有本事踏平蒙古,不是你要称帝,而是 人民要你称帝。到了1915年,梁启超也对袁 说,称帝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时机。 那年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日本宪法学专 家有贺长雄都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民主体制 架构条件可能还不成熟。包括近代一直影响 很大的严复参与搞的筹安会,也在论证中国 的民主可能存在问题。

问: 就是说当时共识是认为民主条件尚未成熟, 应该退回帝制一步步来?

马勇:对,有点像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多年,毛泽东一去世,发现不对,我们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说得更厉害,说我们现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感觉一下子走远了。



图3为袁世凯登基场景

访谈 TALK

问: 但是现在我们调整到实际的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是正确的方向。袁世凯称帝,都认为是一种倒退。

马勇:梁启超后来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辛亥前十年,中国知识界一个劲儿批判皇帝,把皇帝的神圣光环全部剥掉了。偶像是要靠人塑造的,如果光环都给剥掉,那就行不通了。梁启超认为,如果要走向帝制,首先要找出高贵的皇族血缘,当时如果推孔子的后人或者朱元璋的后人,可能这一点就可以解决。如果这些外部条件没解决,皇帝此前都已经被章太炎他们骂成五谷不分了,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

问: 这就是所谓"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吗?呵呵。

马勇: 这是舆论的作用,尤其近代新媒体兴起之后,不断引领这种论调。比如1900选大阿哥之前,端王没有担任过什么工作,他的观点是左是右,是排外还是亲

美,没人知道。但是媒体塑造他是一个排外分子,那他就是排外分子。而且媒体说得多了,他就逐步往这个方向走。这在传播学研究上是有道理的。

当然,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再复辟失 败之后,再没有一个人可能恢复帝制了。从 那之后,有本事的就当假皇帝,没本身的就 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最厉害的是段祺瑞,他 从袁世凯死之后就是内阁总理,一直不动 声色地带着中国走了很远,比如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为中国赢得一次机会。1926年, 三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他退出历史舞台。在 此之前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代,民族 资本和媒体在这段时期发展最好。但他从 未做过一把手。最大的职务就是执政府。在 他之后, 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了。不要皇帝 的名义,不要最高领导人的名义,但要掌握 实权,这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带来的 一个负面影响。这就导致现在的集体负责, 集体不负责。

我们现在是回归到一百年前了

问:好像晚清时期很多状况都与今天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你描述那时"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马勇: 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好像是回归到一百年前了。

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二十年的书,从 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 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 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等也发展很快。



間 區 列 可 國 四 法 海 天 ب 岩 此 大 英 同 外 誻 利 堅 利 國 國 2 王 四 囡 郎 秋 遐 者 孤

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

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 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 1884年,法国要求越南独立,实际上变为它 的变相的殖民地,我们乖乖同意。但是1894 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 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 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 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 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

问: 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

马勇:一百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都是一流人才,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都是一顶一的。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就是因为总在强调中国本色,只学别人坏的。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原创性的科学没学来,只学了盗版。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

问: 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嘛。

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都具有阶段性意义。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但是在18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到了后期就反动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四个坚持"是对着当时国内党内政治上的守旧势力说的,意思是不要怕,先迈开步子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会变,但是同一个口号到了今天就不是原来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仍然能够调整。

问: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你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

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

访谈 TALK

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邓小平不也是这么讲吗,一个好的体制可以约束坏人不做坏事,一个坏的体制好人可能办坏事。我们一百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掉了,后来共产党执政,1949年又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体制废弃掉了,全盘引进苏联体制。这大概是20世纪最惨的两个事情。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吧。

问: 可是目前的状况似乎也无法期待它自我调整, 你认为应该期待的只有外力?

马勇: 今天上午就有个外力出现, 拉登 之死很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机会。在过去 十年,由于拉登恐怖主义的存在,以美国为 首的国际主流社会需要中国的合作,因而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可以说是睁只眼闭只眼。 中国缺少外部压力,改革的自觉心就少了 许多,实事求是地说,过去十年,中国在经 济上分享了全球一体化的成功, 但在社会进 步、政治发展上可能处于一个退步或不进则 退的状态。现在, 拉登死了, 国际格局肯定 会变化会调整,中国要能适应它。我觉得这 个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是对国家民族有 益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强大是虚假的,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强大。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 在制裁着我们,不让我们买高科技的产品与 武器,才造成我们今天三万亿的贸易逆差。 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同等国家对待,我们买 人家一艘航母和几十架战机,马上就没了。 现在我们就是对内宣传强大,实际上在国际 形象中如此尴尬。

这就是当年李鸿章的困惑:人家没有把中国当作平等的一员来看待。国际社会觉得中国的利益集团依然存在着"异质思维",为了自己短期的特殊集团的利益,不顾全国。现在比我写的晚清时期的统治水平还要差。晚清毕竟有二百多年的王朝责任感,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现在的体制是一拨饿狼吃饱了下来,又一拨饿狼再上来,导致统治者没有主人公的责任感使命感。

问: 可是外力一定要是战争吗?

马勇:那倒不一定。最近几十年的外来刺激就一点战争都没有,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化解。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1972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就开始了,而且对美外交调整是在毛周时期就开始的。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那时候中华民国是常任理事国,一票就可以否决,但是没办法否决,美国人说你就出去吧。这种外部环境解除,中国才能发生变化。

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 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 亥革命就是对一百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 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 有革命。

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

访谈 TA

TALK

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 美国 历史虽然短,但是美国开国是建立在整个人 类文明的基础上。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 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 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 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 觉得尴尬。

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之后,中美怎么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呢?我们以后怎么不可能出现一个地球为单位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呢?日本地震之后我就发了一条微博,人类应该考虑把世界土地资源均衡一下,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腾挪出来。印度尼西亚年年海啸,多可怜。结果马上

就有人批评,说你这个太理想主义,民族国家还存在着呢。我说的其实只是未来的可能性。回望一千年,那时的人们谁能想到今天中国的情形和庞大呢?研究历史,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大视野,看清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人类的关怀应该是一致的。我现在最反感我们一些媒体的地方是,一发生灾难,就是幸好没有中国人遇难。前两天台湾小火车事故,上海一个报纸用的标题是,幸亏里面没有上海游客,这感觉是最别扭的。媒体一定要向人民传递一些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让我们这个古老而后来稍显落后的民族能够跟上世界潮流,不被其他民族过于耻笑。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

问: 今年许多关于辛亥的书陆续出版, 学术著作、大众历史读物,包括媒体的连续 报道。但其实大部分的梳理只是将过去的 印象细化,或者换一个讲法,解读方式基本 相似。真正说现在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个方 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还是没有多 新的东西。

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三十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

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

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上演的时候,我就发了一篇文章《善待先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电视剧我参与了审片,花了几个月时间,出来之后夸得人很多,骂得人也很多。我觉得电视剧可能有些地方很粗糙,但是那个电视剧对近代历史一些主要人物的

访谈 **TALK**





人性化描写,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问: 这种 "温情与敬意" 的态度是受了钱 穆的影响吗?

马勇: "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几十年,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阶级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

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 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 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不再像过去一些 学者做过的那样去分析历史意义,去分析 长处和不足。

问:通读全书,确实感到你尽了最大善意去对待笔下人物,无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在关键时刻促成偶然机遇的小人物,都能得到你的体谅和理解。不过这样是否会存在把各色人物"美化"的可能?

马勇:这次出版社三个审读看完之后 找我谈了一次,说好像你眼里面没有一个坏 人。从慈禧太后到光复会的小人物,我都觉 得他做的有他的合理性。我讲吴樾置民族 大义于不顾,但他本身我并不讨厌。他给未 婚妻写的遗书也很感人的。拉登死了,好多 人不能理解他,不过他人格里还是有值得你 尊重的地方。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我 的写法就有问题,怎么统治阶级里面都没 有坏人了?不过我想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历 史人物,如果你把他从地下叫醒,他可能会 说:恩,他说的有点道理。按原来的话,他大 概一点也不能接受。

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坏人这一点,我是受了刘再复的影响。他八十年代出了一本书《性格组合论》,认为人是可以很多面的。比如卡扎菲绝对是个恶魔,但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慈父。希特勒很邪恶,但是也有艺术的一面。刘再复当年的解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评价历史不能单一的用阶级的立场。



问: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

马勇: 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

其实,也不能说是创新,中国历史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孔子修的《春秋》,不说了。《史记》里没有一个注释,但我们不会怀疑司马迁,因为他的身份和学识都足以让我们信任。到了现代,由于西方新史学的传入,特别是因为史学体制化职业化,许多研究者并不是出于真爱研究历史,而是一种职业,所以就出现了注释越细越好的现象,因为写作者和审读者都需要方便查证,于是最应该愉悦阅读的史学著作成为不堪卒读的八股。说严重点,这其实都不是值得提倡的学风。

我这次对辛亥革命有很多很细节的解读,是我感觉写得最顺的一次。可能是因为琢磨好多年了。我只想讲出点新意来,许多章节,如果没有新内容,我连这一节都不写了,因为1911年那一年,可写的事情太多了。



不过关于袁世凯,有一点是全新的。即他在摄政王上位之后的开缺回籍。以前我们都是受康有为在海外宣传的强势影响,认为是摄政王是报十年前的仇,趁机整袁,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企图建立中德美三国同盟以抵制日俄英法四国同盟的外交失败,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认为自己要负责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王朝政治的传统,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属于正常的人事更选,当时被换下来的旧臣远不止他一个。

问: 尝试这种写法之前是否会有迟疑, 比如担心学界不认同或者降低身价?

马勇:有啊。在许多体制内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是绝对不敢这样写这样讲的,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中国现状下的生存状态。那时,我坚定地认为作为个人必须要适应体制,但当你在体制内已经有了一点成绩



有了一点发言权了,再继续屈从这些体制内不合理的东西,就不对了,或者说,就显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所以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当然,体制内写作我也得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的追求,当然并不一定能做好。

问: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前主流的研究里,包括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里,都讲清廷腐朽不堪,拒绝改革?

马勇: 这是我们现在意识形态的延续。按理说孙中山推翻了清朝,我们推翻了孙中山的民国,我们对清朝应该有一种"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感觉。但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在抗战时期,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争夺三民主义的继承权,中共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强调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正统,国民党不是,以赢得统一战线中的合法性。这么解读下来,最后就完全按照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构架走,我们这么多年来骂晚清政府,真是莫名其妙。

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

魔化了。革命党是造反派,就像今天有些力主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人把共产党说的一塌糊涂,我们能相信吗?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特别是孙中山被清政府抓过一次之后,在国外有点影响力,无论什么状况都骂。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他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

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 出这个问题。晚清史我们两次被妖魔化,第 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 的革命党。

问: 但是这本书里你对革命党还是很同情的。

马勇: 我没有说孙中山或者革命党什么坏话,出版社一开始以为我会讲革命是不必要的,其实我也很同情、理解孙中山他们这批革命党人。他们对民族都拥有一份情怀,虽然可能因为当局者迷,困在某一种状态,但是你应该相信他们都还是不得了的人物,该妥协的妥协,该坚持的坚持,构成了这部历史。

我从来不会恶意批评或者揣测什么 人,只是理性分析,毕竟历史它就这么走 过来了。**Q**



火焰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



鸣谢: 季风书讯

搜狐新闻

book.soh

網易博客

合作媒体:

news.sohu.com

book.sohu.com

blog.163.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